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中国教育报 编

叛逃“精英” 海外言行录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叛逃“精英” 海外言行录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编
中国 教育 报社



教育科学出版社

9111169

前 言

自诩为改革先锋的社会“精英”，变成了动乱“精英”、叛逃“精英”。更为可悲的是叛逃“精英”一出国门就向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靠拢。他们为求主子们的欣赏和施舍，对社会主义中国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演出了一幕幕闹剧。我们编辑的这本《叛逃“精英”海外言行录》是他们丑恶表演的部分“场记”和对此的评述。

“精英”们在国内时，慑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的力量，他们的政治表演总有所顾及，往往只能讲人话，办鬼事；或策划于密室、沙龙，鼓动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上前台……。可是他们叛逃后，剥去了自己的伪装，尽兴发狂，表演是那么淋漓尽致！我们读一读部分“场记”，会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精英”们的真面目，看看他们鼓吹的一套政治主张到底是要干什么？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引向何方？

我们收选的部分材料，除国内报刊上刊登的以外，也有少数是海外报刊上的报道。对所选材料，我们作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由于条件的限制，对叛逃“精英”的海外言行搜集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望读者赐教。

编 者

1990年8月

目 录

- “黑手”的自供……………梦 省 (1)
-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郑一天 (10)
- “民主中国阵线”在干什么?……………王 晨 (24)
- 丑闻层出不穷 内部纷争迭起
……………袁英婵、彼·克旺 翻译 (55)
- “民主女神”号破产记……………曹道明 编译 (59)
- “民主女神”号海盗广播船惨败记……………董 斌 (73)
- 呜呼哀哉,装神弄鬼的“女神”!……………魏 巍 (76)
- “民主女神”号海盗广播计划破产……………新华社 (78)
- “精英”卖“女神”……………舜 之 (81)
- “不介入”只是谎言……………余 泓 (84)
- 叛逃“精英”亡命录……………何思成 (87)
- 严家其说梦……………韦 骥 (96)
-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徐功敏 (99)
-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马理铭 (107)
- 且看陈一谔的真面目……………龚佐周 金 灿 (121)
- 陈一谔从幕后来到幕前……………韦 骥 (130)
- 柴玲到美国去干了些什么?……………陆 遥 (135)
- 岂能靠谎言度日……………睿 之 (140)
- 岳武其人……………李 欣 宋 郁 (142)
- 主子的民主和奴才的民主……………韦 骥 (150)

“黑手”的自供

——叛逃动乱“精英”曝光录

· 梦 省 ·

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风波。经过这场风波后，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一小撮逃亡国外的动乱策划者，即所谓“政治精英”，却不甘失败。他们在国外公开承认自己是制造动乱的黑手，并且投靠敌对势力，成立反动组织，声嘶力竭地坚持要做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旗手”。一年来，这些反面教员自我曝光，有助于去年由于不明真相而卷入风波的青年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擦亮眼睛，认清动乱的实质，解开思想深处的扣子。

自己承认是制造动乱的黑手

人们记得，去年动乱之初，原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正在美国“讲学”并叫嚷要让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接受在纽约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的派遣，匆匆于4月27日赶回北京，参与策划动乱。他在北师大煽风点火时，曾公然通过广播喇叭说：“我不怕当（动乱）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

他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去年的动乱不是自发产生

的，而是确有一小撮黑手在背后操纵。黑手除刘晓波以外，还有谁？那些“政治精英”出逃以后，在国外反华势力的庇护下，无所顾忌地作了自供。

有一个名叫远志明的叛逃“精英”，原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师，他是《河殇》撰稿人之一。去年动乱期间，曾参加筹组非法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远志明逃亡到法国后，就同正在那里筹建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叛逃“精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谘、苏晓康等人，沆瀣一气，加入“民阵”，成为一名“理事”。他曾“应邀”访问过台湾。今年1月9日和10日，他在台湾办的《世界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黑手与旗手》的长篇反思文章。他在这篇曾同严家其在电话里商量过的文章中公开承认，他们这些人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动乱的“黑手”。他说：“我们曾是学生们的声援者，曾是政府的抗议者，曾是指手划脚的出谋划策者，……”他在谈到他们煽动学潮和动乱的作用时说：“是我们教诲青年学生民主之意义、不民主的现实和奋斗之必须，是我们常常使学生们情绪激昂、热血澎湃，是我们的思想、智慧和爱国感情感染和唤起了他们……”。

叛逃“精英”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自供。据今年4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该报记者写的题为《北京之春根源》一文披露：胡耀邦同志逝世第二天，大学还无动静。“这天上午，大约15人左右的一伙人在北京蓟门饭店举行秘密会议。”“除了未来的学生领袖王丹之外，其他与会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从去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这伙人几乎每天开会，组织极其严密，都有电话传呼机互相联络，“秘密领导着民运的发展”。参加过会议、现已逃亡巴黎的“诗人”老木说，对学潮领导人“他们不是提出简单的建议，而是下命令”。“一切决定

是会议作出的。”“一切都作了周密安排，直至口号。”

实际上，早在动乱发生之前，这些“精英”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底牌”就打出来了。他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毒化青年学生思想方面，搞了不少名堂。例如：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和他的老婆李淑娴的唆使和支持下，由王丹等人在北京大学办起了“民主沙龙”。从1988年5月4日到去年5月12日，这个“民主沙龙”就举行过17次煽风点火的活动，方、李二人几乎每次都参加上述活动。他们打算趁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机，促使学生们搞大规模活动，进而使其发展成动乱，只是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逝世，他们便借机提前行动了。

另一个自称“学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严家其，去年看到学潮起来后，便欣喜若狂，又是参加座谈会，又是写大字报、公开信和紧急呼吁书等，以声援学生名义不断促使动乱升级。人们注意到，数百名学生在黑手们的精心策划和蛊惑下，于去年5月13日下午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严家其等人当晚就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煽动北京的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行动。第二天，严家其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时局的紧急呼吁》。严家其还参加组织所谓“1000名到5000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大绝食行动”的筹备会议，以扩大动乱的事态。后来这一“绝食行动”因响应者寥寥无几而流产。

原四通公司集团总裁万润南，在策划和支持动乱方面也是突出的一个。万润南仅在5月21日到23日的3天里，就5次同非法的“高自联”头头王丹等人策划行动，两次召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会和商谈，密谋阻挠戒严令的实施。在

50天政治风波期间，万润南的四通公司曾出资20万元支持动乱，除了向“高自联”等非法组织运去大量食品、饮料和药物外，还送去了供反动宣传用的器材。

这些说明，动乱“精英”们是货真价实的制造动乱的黑手。

远志明说他们“曾是政府的抗议者”，有些说轻了。政府的确是动乱“精英”当时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但他们岂只是“抗议”，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这方面的例证很多，现在仅举几例。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后不久，严家其4月19日在北京参加了由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举行的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名曰悼念胡耀邦，实际是严家其等人制造舆论，要求否定有关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决策。4月21日，严家其又伙同一些人联名发表《致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向中央施加压力。为了扩散这封公开信，当天傍晚首都一些高等院校都张贴了这封信，台湾《联合报》第二天也全文发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的社论。严家其伙同一些人签名发表了反对社论的“倡议书”，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北京宣布部分地区戒严以后，严家其等人加紧组织的非法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宣布成立，并同北京的“高自联”、“工自联”、“工人敢死队”等一些非法组织结成“神圣同盟”，叫嚷“不怕流血牺牲”，掀起了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暴乱。

自封为“石头”军头目的万润南，在刚刚宣布戒严令以后，便气急败坏地于当天让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起草《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并策划征集人大常委在信上签名的非法活动，企图使“紧急会议”

重点讨论罢免李鹏总理问题。第二天，万润南又通过一家学生的非法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不再是人民政府，各界人士应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

陈一谔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精英”，他当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去年5月18日，陈得到某人给他提供的“内部消息”，于是第二天上午他就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干部和自己所领导的体改所的正处级干部开会，向大家“吹风”。然后，陈鼓动说：“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了，有必要发个声明。”接着，他口授了矛头指向政府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并以“三所一会”名义发表。后来又改变手法，指使用化名、匿名办法炮制了《李鹏其人》、《紧急告全国同胞书》等4份反对政府的传单，煽动群众同政府与戒严部队对立，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这就是动乱“精英”所谓自己“曾是政府抗议者”的真正面目。

叛逃“精英”要当什么样的“旗手”

远志明在《黑手与旗手》的反思长文中总结动乱“精英”的失败教训时哀叹：“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坚强的旗手，也没有有力的黑手。”他说：“知识精英们又的确是黑手，即他们把一只‘民主自由之手’伸到了青年学生们心中，搅动了他们；然而却一直没有伸出来，没有伸到‘民主自由’的行动层面上来……”“思想的黑手始终没有成为行动的旗手。”他在“展望”将来大陆新的“动乱”时隐隐约约说出了要有新的“旗手”，即“一定要有统一、广泛、成熟的反对派”。

现在就来看看这一小撮叛逃“精英”要充当什么样的“旗手”和“反对派”：

引人注目的是，在外国某些反华势力庇护下，严家其、陈一谿、万润南、吾尔开希、苏晓康等人，于去年9月在巴黎拼凑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在成立会上，陈一谿宣称“民阵”的基本纲领就是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在大陆搞多党制。万润南报告了他和严家其、刘宾雁、陈一谿、苏绍智、吾尔开希等人筹组“民阵”的经过。会议选举严家其为“民阵”主席，吾尔开希为副主席，万润南为秘书长，陈一谿、苏晓康等为理事。自“民阵”成立后，这些叛逃“精英”们就更加加紧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

去年10月6日，严家其和万润南在联邦德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民阵’的意义在于，共产党统治40年后，出现了第一个可以和共产党抗衡的独立政治力量。”

去年10月18日到23日，吾尔开希和万润南等人到澳大利亚搞宣传“民阵”纲领的活动。他们叫嚷，一旦“六·四”事件平了反，中国开了“党禁”和“报禁”，“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回北京建立反对党”。

今年2月1日，吾尔开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我看“打倒共产党”》的文章。他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一）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二）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三）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统治。”他的主张是：“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打倒后再不允许（共产党）注册成立”，“而应坚决取缔”。原来吾尔开希之流宣传的“多党制”，是禁止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多党制”。

一心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石头”“精英”万润南，今年2月2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造环境、造

势、回中国》的文章。他说：中国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中产阶级”。“四通可以成为造就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的企业。”但“四通要发展，就受到一党专政的阻碍”。因此，中国“在经济上应实现私有制，政治上需要实行多党制”。所以“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力促中国局势改变”。他扬言，“假如换马了，平反了，再要我回去，我是要回去的；但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而是作为‘民阵’的一分子，成为共产党以外的制衡力量，回中国去。”

今年2月15日，香港《信报》刊登了严家其在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上发表的讲话。严叫嚷：“由各民运团体直接组成一个有明确目标——即夺取政权的反对党，就可以打出反对党的旗号。”他还恶狠狠地说：“我过去只批共产党是不够的，还应批共产主义理论”，“推翻共产党专制独裁。”

很清楚，这些“精英”叛逃海外以后，不再披挂什么外衣，而是赤裸裸地打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并且痴心妄想当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旗手”！

尽管境遇落魄 仍要继续挣扎

一小撮动乱“精英”逃亡到海外寻求庇护已经一年了。他们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替人捧场，为人叫骂，替己壮胆，梦想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可惜蚍蜉撼大树，诸事不顺遂；况且西方正直人士和爱国的华侨、华人都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支持。因此，这些“精英”们的内心失落感日益上升，内部矛盾不断增加，陷于每况愈下的落魄境地。

据台湾《中国时报》去年12月8日报道，“民阵”自9月成立以来，曾在美国和法国筹到40余万美金的经费，但在有关

“民阵”负责人花费无度、浪费铺张的消息传开后，“民阵”收到的捐款已显著下降。11月间，“民阵”总共只收到100美元的资助。

今年1月30日美国《国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民阵”面临三大危机》的文章说：“民主中国阵线1989年在巴黎轰轰烈烈成立以后，很快地由绚烂归于平淡。”“从巴黎会议以后，听到有关‘民阵’的消息，多半是令人泄气的，而很少鼓舞人心的……。”

今年3月12日《纽约新闻》在一篇文章中援引“民阵”理事、《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的话说：“‘民阵’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在组织运作技巧上欠缺成熟和一致意见，导致许多内部矛盾……。”文章又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民阵’目前内部矛盾重重，主要派别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谔的体改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相容状态。”他们初期“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秘神秘”，近期“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之客看待自己，成日悲悲切切，凄凄惨惨”。

当然，外逃“精英”的上述落魄境遇，并未使他们洗心革面，他们当前的主要心态是，继续挣扎，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共产党，幻想挑起新的动乱，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今年上半年“民阵”最突出的反动活动是，乞求台湾的一家电视台、一家报纸和一家组织进行资助，购置了一艘英国旧船，妄图把这艘船改装成海盗广播船后，于4月底驶到中国大陆附近的公海上，搞反动广播宣传。他们于3月9日把这艘船命名为“民主女神”号。但是，自“女神”号3月17日从法国的一个港口启航后，它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碰壁。在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女神”号不断受监视和盘查，到远东后，

新加坡不准它驶入内港；香港拒绝它入港；甚至台湾当局也宣布，“女神”号在公海上广播属于不法行为，因此，不予支持。随后，台湾当局允许在海上漂泊50多天的“女神”号于5月13日暂时停靠到基隆港增加补给。但先期跑到台湾的“民阵”主席严家其，当天到基隆港迎船时却被隔在码头以外。5月18日，严家其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泣不成声地宣布，暂停“女神”号的“广播”计划。接着，5月24日和25日，“民阵”分子分别在巴黎、东京、台北、基隆宣布要拍卖此船，正式放弃向大陆的“广播”计划。这出反共闹剧就这样以“胎死腹中”而草草收场。

叛逃“精英”们还正在筹组所谓“夺取政权的反对党”。据报道，前不久，“民阵”已同纽约的“中国民联”举行联席会议。双方已达成协议，准备“在积极的合作的基础上走向联合”，并“推动(海外)其他民运团体一起合并”，为成立反对党打基础。陈一谔正在发起筹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已允许它注册。陈声称，他正在制定“重建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复杂战略和策略”。上述情况表明，一小撮逃亡到国外的动乱“精英”，虽然正日益落魄，但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加上有某些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他们将会继续挣扎和捣乱。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原载1990年7月21日《中国教育报》)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 郑一天 ·

去年春夏之交，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给我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极少数动乱“精英”，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庇护下，先后叛逃海外，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年，看一看这些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进一步揭露他们的真正面目，有助于我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更清楚地认识这场动乱的性质及其危害，从而坚定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早在动乱之前和动乱期间，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为了蒙蔽学生和群众，动乱“精英”们大都为他们的言行进行了种种伪装，打着“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促进民主”、“为民请命”等等堂皇的旗号以售其奸，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然而一旦逃出国门，来到他们久已向往的“西方自由世界”，这些伪装

的面具则被他们自己统统揭去，露出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据国外报刊报道，苏晓康等人叛逃以后，马上和万润南、严家其、吾尔开希以及先期出国的刘宾雁一起，积极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并由曾经当过赵紫阳“智囊”人物、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当“民阵”的“筹委会主席”。1989年9月22日，“民阵”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正式成立，虽经多方联络，却只有一百多人参加，门庭实在冷落。陈一谘就是这场开幕闹剧的主持人。会上严家其、吾尔开希分别当上了正副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主中国阵线”是个什么组织？他们在海外要干些什么？从“民阵”成员们在海外的言论和活动中，是不难看出的。

“民阵”分子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陈一谘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1989年10月15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让共产党这样的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反复鼓吹“政治多元化”，这个“多元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在1989年12月1日《百姓》杂志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谘毫不掩饰地作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要与虎谋皮”。同年11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讲演中，陈一谘联系5月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说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半年之前，就是这个陈一谘，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

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十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两相对照，陈一谔的伪装，不攻自破，其丑恶嘴脸，则暴露无遗。

在“民阵”的成立大会上，万润南说，“民阵”的成立，就是“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时报》1990年2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万润南进一步表露了他在动乱前后的心曲：“昨天，作为四通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造环境；今天，我作为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我所做的事情是给中国的民主造势；明天，我会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后，以‘民阵’成员的身份回国，作为中共党外的一个制衡力量”。“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稳定的多数，社会不会安定，民主制度就没有一个基础”。“经济上要实现私有制，政治上要实现多党制”。“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第一步，要使中共当局换马，平反……这是我们的短期要求。第二步是开党禁、报禁，这是中期要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是长期所求”。万润南的话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的上述言论，不就是一个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和“步骤”吗？

如果说陈一谔、万润南等人的言论多少还绕了一点弯子，那么吾尔开希的言论则近乎于赤裸裸的反动口号。这个在学校里几门功课都不及格的大学生，靠着搞动乱，摇身一变当上了“民阵副主席”之后，曾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我看“打倒共产党”》。吾尔开希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并特意指明：“共产党在中国海外民运讨论的特定范围内是指‘中国共

产党’”。中共执政四十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执政以前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清楚地表明了它从一个专制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实质是由少数人支配并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法西斯党，对于这样一个党，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

这里还要提到被通缉的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副总指挥岳武。此人原是山西一家工厂的分厂厂长，去年动乱期间参加“工自联”并直接参与了暴乱活动。他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逃到巴黎，随即发表反动声明：“我虽身在海外，但已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与国内的工人团结一致，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可惜至今无人响应，就连海外人士听了在海外“重组工自联”之后，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至于“推翻了共产党”由谁来领导，万润南说：“‘民阵’不是流亡政府，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来讲，它随时准备执政”。吾尔开希也当仁不让：“我是具有民主精神同时又搞过民主运动的人。我曾说，希望成为中国明天的领导人，是希望在民主的机制下，发挥最大的作用”。一语道破了他们妄图取中国共产党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苏晓康是逃往国外较晚的一个，但他的言论却比之“先行者”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后来居上。据1990年12月28日《联合报》报道：苏晓康说，“这次大陆民运失败，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避开问题重心的共产制度缺失，高唱文化救国论，这是典型的清谈，误国的重演”。“六·四之前，知识界没有直接面对最影响人民生活的共产制度，也许是根本不敢碰，……当然也把握不住，冲不出来，这根本是立足点没有搞对”。在1989年10月16日的《百姓》杂志

上又说，“大陆当局并未因《河殇》反传统而饶恕它”，“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应该说，这才是苏晓康的心里话，也是他们拍摄电视片《河殇》及其续篇《五四》的真实目的和最好注解。

既然“清谈误国”，文化也不能“救国”，反传统的《河殇》也推翻不了“共产制度”，苏晓康自有他的办法。在1989年12月30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苏晓康说：“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大陆的民主运动能走‘和平演变’的模式，至少可以少牺牲一些人。不过，我们也不能没有走罗马尼亚模式的准备和决心，也就是内战”。“虽然走‘和平演变’的模式最有利，也不能没有结合武力进行民主运动的准备”。他声称他们要“在下一次的民主风潮中掌握军队这个有绝对影响的重要因素”。读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叛逃“精英”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已经不惜制造内战，让人民流血了。事实再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再想想他们反复鼓吹的“远离政治”、“淡化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等等口号，该有多么虚伪。他们不但当起了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队”，而且疯狂地鼓吹“呼唤”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了。

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为了颠覆社会主义中国，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说、乞求国际社会对自己的祖国进行经济制裁。

据《百姓》杂志报道，万润南在一次谈话中说：“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在海外使得各国对中国施加有限的有区别的经济制裁，加速它的经济困难，施加压力”。万润南讲的“有限度”和“有区别”的含义是什么？刘宾雁的话是最好的补充和解释。他无耻地希望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加紧对中

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民愿意付出这种代价”。

非法组织“北知联”和“高自联”在一份“致各国首脑书”中，公然呼吁“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

陈一谔的话最为典型。他说，“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他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他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至于制裁的目的，陈一谔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海外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至于什么是海外的势力？陈一谔说得更明白：“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台湾的几家报刊也全文转载了《基本法》，认为“这是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划了个句号”。但是据《香港时报》1990年4月6日报道：4月5日下午，“民阵”头头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在巴黎拉德方斯五楼的欧洲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民阵”声明，呼吁港人抵制《基本法》。声明说，“只要中共政权继续存在，香港的前途就没有保障”；主张“由港人自主起草新的基本法”，取代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并“以联邦制或邦联制解决香港、西藏、台湾问题”。结果引起了海外华人

的强烈愤慨，进一步暴露了动乱“精英”们背叛祖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把外国利益和一小撮具有政治野心的“精英”的利益，置于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乞求外部力量给自己的祖国、人民制造经济困难和灾难，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卖国贼、民族败类的行径吗？

背宗忘祖引起公愤

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国人士的普遍反感。早在去年8月5日，由一些旅居菲律宾的华侨组成的“旅菲华侨游子会”就写了一封致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

“你们为自己争一席之地，罔顾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国家、糟踏自己的民族、咒骂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献媚、邀功请赏，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现！你们的行径是背祖忘宗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信中严正声明：“我们反对你们不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地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本会同人的最痛恨某些强国专门收容、收买、支持、煽动各国不得志政客或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分子，然后去搞乱自己的国家，使世界永无宁日”。

即使在“民阵”所在的法国巴黎，叛逃“精英”们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据路透社报道，去年9月的一天，法国巴黎地方官员不让数十名流亡者进入漂亮的巴黎十六区会议大厅，进行百日大祭活动，理由是“会议大厅是公共场所，它不应在一个涉及法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上支持那一方”。因而活动只好在街上举行。去年9月12日晚，严家其一伙在巴黎人权广场集

会，原计划拉拢两千人参加，实际来的只有二百人。

“民阵”为寻求支持，扩大影响，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和苏绍智等人四处活动，策划到各地建立“民阵”支部，先后到过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游说募捐，但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原定由部长级官员会见万润南和吾尔开希的安排，对他们在澳的活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澳新闻媒介也采取了低调报道。就连叛逃“精英”们寄希望甚高的美国，议员们也只是表示了有限的热情。对此，严家其一伙很不满意。对未能见到美国高级领导人，吾尔开希说：“我们的确感到有些遗憾”。殊不知，就连美国一些支持过他们的人，也表示对他们不满，原因是“吾尔开希在美国五次谈到‘天安门事件真相’，五次的口径都不一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吾尔开希的“讲演同事实不符，就连听众也常常指出其错误”。至于这伙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下流的欺骗宣传，更为国际公正舆论所不齿。《欧洲日报》曾刊载一个台湾读者的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谘者流，自诩理论家，但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宪法教授陈嘉祐曾写下专门文章，揭露严家其、吾尔开希一伙制造谣言的无耻嘴脸。文章说：“这次学潮对中国的经济损失，真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是这些学潮的领导人居然要挟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运动，真是丧心病狂，不知他们对祖国所造成的无可挽救的严重破坏”。“美国社会对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相已日渐明朗。这完全是由于几位有理智和公允的美国电视特别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将他们在6月3日夜间和6月4日早晨亲眼目睹的

实况作了详尽的报道，否定了大屠杀的谣言”。

不久前，“民阵”在海外反动势力的协助下，搞了一条旨在造谣惑众，宣传反动主张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定于六月开始向中国大陆播音。据外电报道，“民阵”头头万润南已准备了长达几小时的节目，专门攻击邓小平同志。围绕“民主女神号”上的“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海外舆论也表示了不同看法。《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指出：“这条船的背景、整个行动经费从哪里来，大家都很清楚。单靠船上的设备，根本发射不到大陆去。广播必须经由台湾基隆的发射站转播才能到达大陆。但通过台湾的做法，其客观性就有疑问。新闻从业人员应有的道德操守是实事求是，我希望到时广播的内容不要造谣，不要攻击中国”。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这条广播船的全部经费预算为800万法郎，其中一半由台湾的《联合报》系统及《中国时报》负担”。

对于搞这种“广播船”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连“民阵”的一些骨干都是没有信心的。据有的通讯社报道，“民阵”的有的头头，就借口“太累”而没有参加“命名”活动。有的骨干说：“没办法，总要做点什么才过得去”。另一位骨干说：“我们的活动多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确，拿了人家的钱，不做点什么，能交代过去吗？

“失根”的“浮萍”

叛逃“精英”们在国际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赞助，继而一齐转向台湾，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

早在去年7月25日，台湾国民党海外工会主任郑心雄就同吾尔开希在美国会见并合影留念。由于“民阵”头头对台湾

的大力吹捧，台湾“内政部境管局”于去年12月通过三个团体邀请了包括苏晓康、万润南在内的二十余名“民运人士”赴台。据台报透露，由于“民运团体”与台“接触愈趋积极”，台“政府”决策单位已决定，“行政院”设置大陆事务负责机构，负责处理与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团体联系等事宜”，以“强化海内外反共力量建立共识，齐一步调，共同达到大陆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

最先到台湾的是刘宾雁夫妇。去年12月15日，刘宾雁就开始了台湾的“访问”，并且怀着“第二种忠诚”表示他“要象小学生那样来学习观察”台湾的“成就”，所到之处，赞不绝口。他一会儿说，“台湾比大陆民主”，“这里的政府也比大陆开明”；一会儿讲，“希望台湾能完成四十年新闻发展史，台湾四十年经济发展史等书，给大陆民众一个学习的例子”。还说“将来台湾和香港将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中共垮台，还需台湾的人力帮助大陆恢复和运用”。

万润南是以“民阵”秘书长的身份赴台的。他一到台湾，就到处散发附有接受捐款地址的贺卡。在台湾当局的鼓励下，几位“立法委员”“捐出”100万台币。万润南马上对记者说：“支持民运的就是朋友”。“我们一直把台湾当作争取民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认为台湾当然可以支持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去年年底，台湾《中央日报》报道：一支由作家组成的民运团队抵台访问。他们是诗人老木（刘卫国）、徐刚、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和祖慰。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老木声称：“台湾是复兴基地，所以短期上要对民运做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而长期要规划如何在大动乱后协助大陆重建，台湾的经验 and 人才很重要”。祖慰也称：“除了经验外，台湾实

践民主的过程也将有启示作用，因为两岸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比西方民主的影响更深刻”。远志明则抱怨：“目前台湾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大陆民运发展中其重要地位和责任，多少把大陆民主当成大陆人的事，光是支持、声援、捐款是不够的！无论是李登辉、李焕、严家其或方励之，对大陆前途的关注都应该是相同的”。认为“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建立与经济制度将走向哪一条路，这些都应该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迫在眉睫的准备工作”。他还热心地向台湾献策：“建议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改为‘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以利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这些当年赵紫阳的“智囊”，不是又充当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智囊”了吗？

台湾对苏晓康格外关照。人一到，就被授予“中央日报文学奖”。拿了10万台币奖金的苏晓康自有回报。据台湾报刊报道，苏晓康说，“此行我尤感兴趣的是台湾和东方的民主经验”。“台湾可以提供道义上、经济实力的支持”。“台湾已实现或基本实现了民主政制，而代价震动比较小，但台湾实现了民主政制并非全中国实现了民主政制，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理由卸下肩上的重担？”“若大陆出现乱局，中共垮掉，社会崩溃……台湾这些政党能带些什么到大陆去取得合法地位”。殷殷热望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刘宾雁在台湾领赏的丑恶表演，《中流》第三期曾有所披露，在此就不详述了。

陈一谘和苏绍智虽然没到台湾，却是有话在先。还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这个自吹为“中共改革派”的陈一谘就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统治下，大陆已形成一种共产党文化，如果仅仅依赖三民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如台湾今天所有的建设成果”。苏绍智则在去年10月5日在

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讲演时就说过，“类似台湾的民主化未来在大陆可行”。

对于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言行，台湾当局立即给予回应。据台湾报刊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面对大陆民主运动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文章。文章说，“就短期目标而言，可在宣传上着力，借着他们（民运分子）的言词和行动，让全世界更清楚认识中共的本质，凭着他们自身的心路历程，让仍对中共有幻想者幡然省悟，这种彻底而完整揭露中共面目的工作，可继续进行”。就前期而言，对“大陆民主自由的战斗，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战者，这场战争是影响整个中国前途的，没有人可以隔岸观火”。

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表演，引起了台湾知识界的批评和反感。台湾学者李敖在《世界论坛》90年1月4日发表的《“民阵”的归宿》一文，就颇有代表性。文中谈到：“刘宾雁这次来台，我不肯见他。他赠书写信来，我题诗回去。……期勉刘宾雁立场要站稳，不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扯在一起”。“天安门事件以后，有大量‘民阵’之类的人士，或大陆留学不归人士出现，他们的处境与困境，是可以概见的”。“他们离开大陆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们想在大陆以外成些势力或气候，或对大陆发生什么大作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水平’上却不无差距而不自知。他们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却同时又要‘公审’别人。……如今又群集台湾，向国民党讨资助。虽然他们的处境与困难，令人同情，但是失格与混乱一至如此，却更令我们叹息”。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平息反革命暴乱至今已近一年，“民阵”成立至今也半载有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的真相已昭然于世，叛逃“精英”们制造的谣言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目前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和孤立，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民阵”活动了不过短短几个月，却在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几乎难以为继了。今年3月12日，美国《纽约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文章说，“在几个月的轰轰烈烈之后，总部设在法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目前正处于低潮”。“民阵目前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派别分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谔的体改所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和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以上四派，目前严、吾两人较为靠拢，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容的状态”。“民阵主要成员中，其中有一些本来就与学运民运有距离，只是‘票友’，而今却因不得已而‘下海’，思想准备不足”。“该批成员，由于过去在中共改革派内红极一时，去国后又数次对形势估计错误，过于乐观，初期无法摆脱中共‘幕僚’的心态，总把其他民运人士看成‘痞子’，因而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阶段，又走向另一极端，致使巴黎民运人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国外观察家评论，这些人很可能“堕为半个世纪前的白俄的流亡心态”而“一事无成”。

苏晓康在列举“民阵”面临的“难题”时说，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他们的“民主意识”处于

“幼稚园的水平”。在内部更是“内讧不已”，“一味排除异己”，“在选举等问题上违背民主原则”，并成为一种“通病”。这也足以说明，这些以“民主”、“民运”、“民主女神”、“民主阵线”相标榜的“民主派”，不过是一批与民主无缘，甚至是反民主的历史小丑。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目前有个别参与民主的风头人物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至于‘极少数极少数’贪污街头六·四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更不值一提了。还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完全丧失了民运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独立性，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应政治条件者”。

据合众国际社驻北京分社的戴维说，吾尔开希可阔气了，身着300美元一套的西服，还从外地请朋友专程到波士顿吃海鲜。他在波士顿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女秘书。在他们那伙人中已经有人提出他贪污的问题。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吾尔开希在金钱、异性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且学识浅薄”。

多行不义必自毙。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动乱“精英”们的最终结果还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好戏还在后头，这一帮小丑怎么混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人们，你们要警惕”。

（原载《中流》1990年第五期）

“民主中国阵线”在干什么？

· 王 晨 ·

说明

1. 本文以国内外公开出版物刊登的及电台播发的材料为依据。
2. 自关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报道收起。
3. 材料的范围主要是其成员在国外的活动及言论，亦含与其有关的外国政府、团体的言论。

* * * *

1989年9月22日

法新社以《民主中国阵线正式成立》为题，播发一则消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聚集在‘北京之春’的理想旗帜下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于1989年9月22日至24日在巴黎召开”。“严家其、陈一谔、万润南、吾尔开希、苏晓康等出席了会议”。陈一谔在会上宣布：“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为基本纲领的民主中国阵线正式成立”。万润南报告了他和严家其、刘宾雁、陈一谔、苏绍智、吾尔开希等人，三个月来倡议筹组“民阵”的经过。会议通过了“《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宣言》和《民主中国阵线章程》”。“选举严家其为该阵线主席，吾尔开希为副主席。任命万润南为‘民阵’秘书长，陈一谔、苏晓康为成员。‘民主中国阵线’的总部设在巴黎”。

消息说：法国社会党、共和党，波兰团结工会，西德社

会民主党，英国社会自由党，欧洲议会和意大利社会党均派代表参加了成立会，并先后讲话，支持“民主中国阵线”。

1989年9月24日

《亚洲周刊》以《巨款成“包袱”》为题，刊登该刊记者写的一篇报道，记北京学运期间，香港人捐了近3000万港元，支援大陆民运。“六·四”以后，民运消声匿迹，巨款成了“烫手的山芋”，“港支联”一核心成员就这笔款怎么使用对《亚洲周刊》的记者说：“港支联常委会最近计划拨300—500万元支持‘民阵’。”

1989年9月25日

在巴黎出版的亲台中文报纸《欧洲日报》9月23—25日(合期)刊登“民阵”成立宣言的全文。宣言说：民主中国阵线是一个旨在“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政治组织”，其纲领是根据“北京之春”的精神，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维护基本人权，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中国。”

1989年9月26日

法新社披露的一则消息说：“一些法国教育人士最近创办了一个新的声援协会，即与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联系协会”。该协会“负责在法国接待、收容和安置那些因其政治观点不同而在中国受迫害的人”。已帮助安置的“有周末在巴黎创建民主中国阵线的发起人严家其、陈一谔、吾尔开希等”。

1989年10月6日

据新华社波恩消息：严家其、万润南在波恩召开记者招待会。万润南在会上声称：“民阵的意义在于，共产党统治40年后，出现了第一个可以和共产党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如果说原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只是在体制内、在共产

党内部进行，那么现在这种精神的改革、政治改革有了一种体外力量”。

1989年10月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发表该刊主编李怡写的“专访”陈一谔的文章。在谈到“民阵”是否要有长期在外的打算时，陈一谔说：“我们在海外要有个长期打算，三年、五年、八年，要研究理论，组织人才，协调各种力量”，“并通过传媒发动国内同胞进行抗议和争民主的斗争”。

1989年10月26日

法新社披露：法国《当代》月刊等几家杂志支持“民主中国阵线”以文传方式把伪造的《人民日报》传到中国大陆。

1989年11月2日

《世界日报》刊登消息说：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道布伦基及中国事务科科长韦德曼1日在国务院内与万润南晤谈，就“民阵”在美国的工作，中国之未来及大陆在美留学生问题进行讨论，并说：“这次公开而正式的接触，是对‘民阵’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势力的一种肯定”。

1989年11月7日

台湾《联合报》以《90年元月·黎明即将来临》为题，报道苏晓康、远志明等共同创办民运刊物。在谈到该刊宗旨时，苏晓康说：“《黎明》承继天安门英烈的宿愿以促进中国人民的民主斗争为目标，关注台湾、香港、澳门的民主进程，反映‘民阵’等海外民运的主张”。

1989年11月13日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万润南在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说：“‘民主墙’不是不可以再度出现于中国大陆”。

1989年12月1日

《香港时报》刊登该报记者写的《人民日报出现民运版》专讯，说海外民运分子精心制作了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民运信息报，希望以这种伪装的形式将“民阵的主张传入大陆”。

1989年12月8日

台湾《联合报》刊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写的专访《“民阵”监事岳武》的报道。岳武说：“人民有权选择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方式”，主张“借助国民党的军力和财力，推翻中共现政权”。

同日，该报还刊登其记者写的《“民阵”往前走，不看脚下——专访万润南谈“民阵”的自我反思》。万润南说：“‘民阵’的价值，是在于对国内的影响”，“我们明春在欧洲召开‘和平演变国际讨论会’和有关‘八九民运的讨论会’，加强与其他民运团体的联系”。

1989年12月15日

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吾尔开希、万润南等人会见记者谈设想：在匈牙利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打倒共产党独裁问题》》。万润南说：“民阵准备明年3月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一次国际讨论会，讨论‘打倒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目的是就东欧日益高涨的民主化运动的经验等交换意见，讨论今后推翻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行程和前途”。

1989年12月19日

《中国时报》报道：“民阵”主席严家其于10日正式宣布：“万润南、苏晓康等人，以个人名义赴台参加政治大学国际中心主办的大陆民运讨论会”。

1989年12月22日

《联合报》披露：“内政部昨天通过首批大陆著名民运人士

来访案，计有万润南、苏晓康、李禄、老木等20余人”。

1989年12月23日

新华社堪培拉消息：“民阵”头目吾尔开希、万润南、付磊和曹务奇等4人，于18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亚活动，宣传“民阵”的纲领。声称：“一旦六·四屠杀得以平反，一旦中国开了党禁和报禁”，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北京成立反对党。

1989年12月28日

《香港时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台北的消息，说刘永川、张锐、万润南等出席由《远见》杂志和新时代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面对台湾——谈中国未来”座谈会。张锐说：台湾“将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大后盾和抗争中共的主力军”。万润南说：“产权清楚的经济制度及结束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不二法门。而这两者不寄望于中共”，“只靠体制内的改革，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1989年12月30日

《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写的专访苏晓康的报道，苏晓康说：“我们还是希望走‘和平演变’的模式”。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消息，说万润南在“面对台湾——谈中国未来”研讨会上发起全球支持民主运动人士签名运动，向中共领导提出七点强烈呼吁，要求保证政治流亡者和民运留学生能平安返回大陆，该报全文刊载了这封签名信。

1990年1月7日

《香港时报》刊登中央社一则消息：“民阵”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宣布在台设分支，成立“大陆民主促进筹备小组”，预计在六·四前成立正式机构。万润南、苏晓康、杨中美、刘伟国、黄伟成、远志明等到会。万润南说：“在台湾成立民阵机

构，不
1
志明、
上说：
“体制
量和
之路”

由前
“当
成立
变革
的
历史

时

民
民

当

构,不光是募捐,同时也希望得到台湾人力与思想上的支持”。

1990年1月13日

据《香港时报》刊登台北的一则消息,万润南、苏晓康、远志明、胡平等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大陆问题座谈会。万润南在会上说:“民阵是八九民运的产物,其诞生即代表幻想的结束”。“体制内的改革是不成功的。不过,我们必须结合体制内的力量和体制外的力量,才能结束大陆的一党专政,走上多党政治之路”。

1990年1月14日

《联合报》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发自纽约的一则消息说:由前中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发起筹组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已在美国注册,并将在今年四月正式成立。陈一谘在谈到该中心筹建计划时说:“如何制定出在变革过程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复杂的战略和策略,不仅是重建中国,而且是重建东欧与苏联的历史性任务”。

1990年1月23日

《香港时报》报道,“民阵”监事岳武在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说:“谁支持民运,谁反对共产党,谁就是我们的朋友”。

1990年2月1日

《香港时报》刊登1月30日由严家其、徐邦泰签发的《民阵民联联合公告》,公告说:“民阵”与“民联”在日前召开的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上,达成以下协议:

1. 民阵和民联作为中国海外民运的两支主要力量,应当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迅速走向联合,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结束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而努力奋斗。

2. 民阵和民联在条件成熟时向组织上的合并努力,并

推动其他民运团体一起合并。

3. 今年四月下旬在欧洲召开东欧局势研讨会，召开民阵理事会和民联联委会的联席会议，具体研究双方在组织上的合并问题。

4. 民联和民阵将在“六·四”周年纪念活动等一系列工作项目上直接合作，组成1990年“六·四”工作组，并为双方在组织上的合并以及更广泛的联合创造条件。

本日纽约《世界日报》发表吾尔开希《我看“打倒共产党”》的文章。吾尔开希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正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即它虽有存在和执政的权力，但应当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使它不能执政”。

1990年2月2日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万润南《造环境·造势·回中国》的文章。万说：中国“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稳定的多数，社会不会安定，民主制就没有一个基础”，“四通要成为造就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的企业”。但是，“四通要发展，就受到一党专政的阻碍，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明确”。在谈到未来的目标时，万说：中国“经济上要实现私有制，政治上要实行多党制”。“所以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力促中国局势改变。第一步要使中共当局换马，平反——六·四凶手要换，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这是我们的短期所求。第二步是开党禁、报禁，这是中期所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是长期所求”。“假如换马了，平反了，再要我回去，我是要回去的。但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而是作为民主中国阵线的一分子，成为共产党以外的制衡力量，回中国去”。

199
香
马到成
春伊始
联席会
泰、丁
是当务
——即
他说：
论”。
明白清
究计划
和农民
谄在
大会
席。
强宣

艘被
发，
说：
加速

1990年2月15日

香港《信报》发表宗珊写的《民主必须马不停蹄，联合才能马到成功——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纪实》。文章说：马年新春伊始，海外民运人士在美国首都华府召开“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严家其、吾尔开希、金岩石、胡平、黄奔、徐邦泰、丁楚、刘永川、曹长青等到会。严家其在会上阐述联合是当务之急时说：“由各民运团体直接组成一个有明确目标——即夺取政权的正式反对党，可以打出反对党的旗号”。他说：“我过去只批共产党是不够的，还应批判共产主义理论”。“推翻共产党专制独裁，建立新的共和国的口号一定要明白清楚不含糊”。严家其还倡议为未来中国制定全国的研究计划，他说：“就将来的国策，如宪法、私有化运作、土地和农民、议会制、税收法、和平统一诸问题，……将来与陈一谔在普林斯顿设立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协调提出建议”。

1990年2月19日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民阵”美国分部十七日举行成立大会，通过分部章程，选出杨建利为分部主席，崔岳为副主席。杨建利对该记者说：“‘民阵’今后的工作面向大陆，加强宣传，发展完善组织，并做些研究工作”。

1990年2月26日

《香港时期》刊登台湾“中央社”发自巴黎的一则消息，一艘被命名为“民主女神”的船，定于3月9日从法国西洛赛港出发，前往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消息引用“民阵”发言人的话说：希望“这座航行在中国大陆沿海的‘流动广播电台’”，“能加速中共一党专政提早结束，催发中国大陆民主运动”。

1990年2月

《争鸣》杂志发表文章，题为《一个新政党在催生中》。文

章说：“以全美学自联副秘书长石和平、旅美学人王建安等人为主的民运人士，一直为筹组政党而不是民运团体而努力”。一个“以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为宗旨，以打倒共产党专制为纲领目标的政党正在美国催生”。文章说：“1989年9月，他们在维吉尼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请专人起草党纲。89年12月26—28日，他们又在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召开组党会”，“决定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并通过了临时党纲”。

1990年2月27日

台湾《中国时报》刊登吾尔开希2月20日代表《世界人权同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发言，攻击去年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公然极为明显的侵犯”，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1990年3月1日

香港《百姓》半月刊杂志刊登刘千林写的《访严家其谈中共当政40年的功过及中国的前景》。严家其说：“中国要达到现代化”，必须“在共产党之外有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第一要结束一党专政；第二要保障私人财产的权利，充分发展民间经济”，使中国的经济制度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1990年3月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刊登苏晓康的文章说：“我生下来就落在一个有固定价值观念的社会。这个价值观念就是虚假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有人问我，你对共产主义信仰还信不信？我说，我不信了”。

1990年3月6日

台湾《联合报》披露：“民主中国阵线与东欧国家政党及政治组织，拟成立国际性的民主论坛，对共产党国家结束一党

专政后如何

1990年

《中央

尔开希关于

的广播电台

闻，催动中

1990年

法国《

曼·弗明克

章说：“与

运动的‘民

战”。这个

将会“起很

1990·

《香港

启航礼，

“我将在中

到中国大

说燕萍毕

年8月通

1990

美国

苏晓康说

主意识”

有的仅以

惨，甚至

1990

专政后如何踏入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进行长期性研究”。

1990年3月9日

《中央日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巴黎的专电。电文引用吾尔开希关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话说：“这个在海洋浮动的广播电台基地，将是‘民主中国阵线’藉以突破中共封锁新闻，催动中国大陆民运的最佳方式”。

1990年3月10日

法国《解放报》3月10日至11日一期，刊登了该报记者罗曼·弗朗克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民主女神号船启航》。文章说：“与法国《当代》杂志及世界20来家报纸一起组织这次运动的‘民主中国阵线’，将从那里向中国当局发起真正的挑战”。这个《民主之声》广播电台，对促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将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1990年3月11日

《香港时报》刊登中央社消息，题为《“民主女神号”举行启航礼，燕萍任节目主持兼播音员》。文中引用燕萍的话说：“我将在中国大陆沿岸的公海上，把自由世界的民主信息，传到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加速中共一党专政的败亡”。该报说燕萍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曾任“工人出版社”编辑，于去年8月逃抵巴黎。

1990年3月12日

美国《纽约新闻报》刊登《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苏晓康说：“民阵正处于低潮”，“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意识”，因此，“士气受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

1990年3月16日

《百姓》半月刊杂志刊登《刘宾雁谈：民运、台湾、大陆》，刘宾雁说：“一些民运人士，打着民运的招牌，招摇撞骗，争名争利，拼命攻击别人”，甚至“个别民运人士把捐款占为己有”，“这对中国的民运事业是一大损害”。

刘宾雁还说：“我当初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但“中共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我当时所追求的”。

《百姓》还刊登了陆铿写给菊人的信，信中说：“随函寄上曹长青老弟为《新闻自由导报》写的小结《风风雨雨九个月》，从中可以看到‘6·4’在海外，主要是在美国激起的波澜。对他们有些作法我是不敢苟同的，如印假《人民日报》”。但是，“按我的看法，海外民运如果不面向大陆，结果必然是水中月雾中花”。陆说：“比较值得重视的，则是民主中国阵线准备4月20日起从国际海域的一条船上发射的‘民主中国之声’的广播”，“特别是当‘民阵’陷入低潮之际，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佳音”。

1990年3月18日

《中央日报》刊登《声援“民主女神号”，港支联加入广播行列》。港支联发言人说：“该联合会将加入大陆民运人士‘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对大陆进行广播的行动”。并“于此间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大陆民运人士，举行记者招待会等一连串的活动，以纪念、支持大陆的民运”。

1990年3月19日

《香港时报》报道，严家其由法国前去瑞典参加有关《中国民主化进程》学术讨论会，还拜会瑞典各党派的领袖。

1990年3月23日

《香港时报》刊登蔡咏梅写的《专访“民阵”发言人许天方》。许天方说：“民主女神号出发以后，我们现在正忙着在

巴黎
国大
计划

国社
会，
主持
际，
民运

若嗜
以后
非常
大的
的创

希，
的
国
治，
杀

领
的

巴黎录音制作节目，主持人是法国NOVA电台负责人”。“中国大陆留学生李三元主持的‘六·四之声’电台也参与了广播计划，并作出了人力方面的支持”。

台湾《中央日报》披露一则消息，说“由法国、美国等外国社会团体及中国民运团体组成的中国国殇纪念活动委员会，于昨日在巴黎成立，严家其任该委员会名誉会长，闰淮主持日常工作”。该会的任务是：“在八九民运爆发一周年之际，将动员全世界的华人社团、留学生学者组织，以及中国民运团体”，组织各种活动，“纪念6·4烈士”。

1990年3月26日

据《明报》报道，《广场》杂志此间在美国芝加哥创刊。陈若曦任该刊社社长，戴厚英任主编。陈若曦说：“北京‘6·4’以后流亡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世界各地的大陆知识精英，非常之多，这些学者将对海外华人未来的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广场》杂志的创刊，即为这些海外精英，提供充分的创作天地”。

1990年3月27日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消息，说正在西班牙访问的吾尔开希，25日在接受巴塞隆纳卡塔茵电视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中共政权在三至五年内必定垮台”。“去年6·4以后的所有外国贷款都被中共用来加强其独裁政权，以对人民施行暴虐统治，未来（取代共产党）的新政府永远不会承认6·4天安门屠杀之后外国给予北京的所有贷款案”。

1990年4月1日

《百姓》杂志刊登赵苍柏写的文章说：“分析‘民阵’的纲领和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对西方了解的很多，而对中国了解的很少，他们有很多书本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

《百姓》还刊登曹慧燕写的专访，题为《艾端午谈海外民运》。艾端午认为：“海外民运应有强大的理论阵容，迅速组织队伍，总结6·4事件及其教训，提出政纲，形成中国的民运理论体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传媒，展开强大宣传攻势”。这样“大陆人民就会有方向和思想准备，就会出现成熟的运作”。他强调说：现在“海外民运要作好两手准备，即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决不放弃武力的准备。要迅速建立自己的训练基地、丢掉幻想、放弃空谈”。

1990年4月5日

《中国时报》刊登一则消息，说“民阵”在6·4一周年之际，筹办十大活动。其十大活动为：1. “6·4”全球祈祷；2. “6·4”一周年大游行；3. “6·4”世界民主日；4. “6·4”一周年艺术展览；5. 89民运与重建中国理论研讨会；6. “6·4”一周年义演；7. 游说美国国会经济制裁法案工作计划；8. 告中国同胞书；9. 告世界共产党人书；10. 中国民主运动电视节目播放。

1990年4月6日

《中国时报》刊登了江素惠写的《专制大陆和民主台湾不可能统一——专访民阵主席严家其》。严家其说：“现在海外有几千个大大小小的民运组织”，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结束共产党在大陆一党专政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严说：这些海外的民运组织，应视为第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政治是在没有统一的法律、规章约束下，分布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团体之间和政治团体内部的政治”，如果“一党专政在大陆结束，第四种政治一定会在更大规模、更大程度上呈现”。这对“今后我们回到中国大陆建设民主政治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统一的问题时严家其说：“中国统一的前提是，使海峡两岸都走向民主化，在和平、自由、民主的基础

上”，“

19

《中

重睹6·

举办“

松。谢

的青年

给予他

了此项

19

《1

——陈

一落说

期来研

他说：

服务三

“中国

治状况

1

看

话说：

层的政

起而

手法”

1

《

谈》。胡

上”，“建立一个带有联邦特点的联邦制共和国”。

1990年4月7日

《中国时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巴黎的专电，题为《让世界重睹6·4悲壮史实》。电文说：“博爱拱门基金会”5日在巴黎举办“北京之春”展览会，主持此项活动的是法国前外长谢松。谢在记者会上说：北京“天安门事件快一年了，参加学运的青年们是那样的渴望自由。因此，我们谨呼吁中共政权，给予他们人性的尊严与自由权利。也因此，我们基金会筹办了此项展览，其目的就是为世界人权而斗争”。

1990年4月8日

《联合报》刊登《从共产到民主，找出适用的过渡战略——陈一谘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目的与工作计划》。陈一谘说：现在海外民运认识到，需要“立足现实，着眼于中期来研究中国的基本问题，以求一旦有变，能够发挥作用”。他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希望在战略研究、人才储备和咨询服务三方面作出贡献”，“希望明年中或到年底能够提出一份“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报告”，包括中国未来的“经济制度、政治状况、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等综合分析书”。

1990年4月9日

香港《新报》刊登《陈军研究“T计划”》。消息引用陈军的话说：现在大陆民运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分布在党政军高层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一旦中央领导层出现变动”，他们将起而“强占电台、电视台、人民大会堂，甚至实施更激烈的手法”。“这是提出‘T计划’进行研究的动机”。

1990年4月12日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亚洲学会年会民运座谈》。胡平、万润南出席了座谈会。万润南在发言中呼吁海内

外的民运人士，“加强团结，将民运组织从海外发展到大陆，唯有海内外相结合，才能使民运在大陆获得成功”。座谈会上他盛赞台湾的民主进展，说“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可以借鉴其经验。

1990年4月13日

据《香港时报》报道，《民主中国》月刊创刊号已在全球发行。苏晓康担任该刊社社长，远志明任主编，严家其等7人为编委。苏晓康在创刊号题为《成熟与期盼》的代发刊词中说：“针对40年来大陆民主历经的风风雨雨和八九民运的得失，需要民运人士以冷静的理性加以分析、研究；同时，对大陆政局的走向及下一次变局后的重点等更为紧迫问题，应立即着手提出对策”。

1990年4月15日

据《香港时报》报道，陈一谔在刚出版的《民主中国》创刊号上撰文，题为《实行民主力量的大联合》。陈一谔说：“海外民运已实现三大会师，即十年来以不同策略、不同方式推动民主和改革事业的各种力量的大会师；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工人、市民等各个不同阶层的大会师；以及海外各种力量的大会师”。他说：“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获胜的条件就是大家联合起来”。

1990年4月16日

台湾《中国时报》刊载《万润南：再过三年我们去闯关》的报道。万润南说：“在海外流亡久了，对大陆的作用愈来愈小，对大陆的感觉愈来愈差”。他说：“中国民运的根在大陆”，“再过三年我们去闯关”，“即使坐牢也愿意”。

1990年4月20日

台湾《联合报》刊载《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9条，公海

广播属
法学者
广播属
国家均
号在公
和船，
海
1965年
海洋公
19
《
美创刊
士林作
明标示
1
1
研讨
民主
和专
他说
中国
努力
的一
邦制
民阵
问题

广播属非法行为》。报道说：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国际法学者丘宏达指出：“依国际法之规定，在公海上未经许可之广播属非法广播，依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9条，所有国家均应该制止在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如果民主女神号在公海对中国大陆广播，中共可以逮捕从事广播行为的人和船，扣压其广播器材”。

海洋大学海洋研究所教授黄异说：1959年国际电信公约、1965年欧洲防止由国家领土外电台广播协定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皆明文禁止过这种非法的“海盗”广播行为。

1990年4月21日

《香港时报》刊载中央社的一则消息，题为《“自由论坛”在美创刊》。消息说：继《民主中国》之后，又一本由大陆民运人士林伟创办的杂志《自由论坛》已经出版，该刊的宗旨公开鲜明标示反对中共，并倡导推展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

1990年4月22日

台湾《联合报》刊载严家其21日在《转变中的东欧及中国研讨会》上的致词。严家其说：“1989年发生在中国和东欧的民主运动，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标志着以暴力革命和专制极权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体制已经遭到人类的抛弃”。他说：现在世界已掀起民主的浪潮，“变革的种子已经播下，中国大陆会出现空前的巨变”，“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国际关系，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实行多党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即实行联邦制、实行市场经济”。

《中国时报》刊载《从“柏林会议”到“民主女神号”——访民阵秘书长万润南》。万润南说：东欧现在最严重的仍是经济问题，他们的经济“乃是在民营化的过程中，没有找到过渡方

式，特别是大型国营企业。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错，至少东欧还没有诸如‘四通公司’这一类的企业。因此，东欧结束一党专政的经验足以提供给中国，而中共的经济改革经验，又足以提供给东欧”，中国东欧经验可以互补。

1990年4月23日

据新华社报道，由“民阵”和东德的“新论坛”等组织在东柏林举行的所谓“国际论坛讨论会”22日成立“民权与人权国际论坛”，并发表一项声明。

声明说：该组织的宗旨是，“维护人民自决权，消除民族利己主义；建立公正的经济秩序；建立能够促进并巩固尊重人权与民主的经济结构；实现对内对外的非军事化；建立没有安全人员的法制国家；要有全面的政治避难权和废除家长制等”。

声明称，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使它作为一个国际信息网，支持民主化进程，交流经验与观点，促进国际范围的人权保护。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的联合”。

1990年4月24日

在柏林参加“转变中的东欧及中国大陆”研讨会的万润南，23日在大会发言，《香港时报》发表报道。万润南说：“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圆桌会议，共商国事的局面”。希望“未来的圆桌会议，包括共产党、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代表”，坐在同一张会议桌上平等的讨论，“波兰的团结工会在这方面的智慧值得学习”。

1990年4月25日

《香港时报》报道，正在台湾访问的民阵发言人许天方，24日在中山楼召开的“全球华侨会议”上坦呈海外民运的种种困难，他说：“我们没根，如果没有国内和各界海外侨胞的

支持，我们的生存机会都没有，更遑论向大陆进军，所以，仍希望大家继续一本初衷，给予支持和指导”。他说：“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必须依靠台湾这棵大树”。

1990年4月27日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民阵与民联互订新措施，领导人员加入对方组织》。消息说：中国大陆两大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团结联盟”采取了两组织联合的新措施，民联主席胡平、副主席黄奔、联盟委员会主任徐邦泰和总干事汪岷于23日加入“民阵”，而“民阵”主席严家其、秘书长万润南同日加入“民联”。

消息还说：为了共谋联合事宜，“民联”和“民阵”于26日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双方的联合步骤。

1990年4月28日

台湾《联合报》披露一则消息，题为《“民阵”与“民联”通过严家其、徐邦泰建议——成立反对党筹备委员会征集签名》。消息说：民阵理事会10名成员和民联11名成员，昨日在柏林集会，通过严家其、徐邦泰所提成立反对党的筹备委员会的议案，并决定从即日起征集签名，开始起草党纲、党章，于6月4日对外公布筹备报告。

1990年5月1日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题为《胡平发起一人一信运动，纪念6·4天安门大屠杀》的消息，引用胡平的话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我们信仰的情势。敦促世界各地华侨每人寄封信到大陆，以纪念6·4大屠杀”。他煽动华侨与自由世界“继续支持民主运动，以协助推翻中国大陆政权”。

谈到台湾对大陆的投资时，胡平表示“反对与当地‘公营’企业进行任何技术投资”。

1990年5月2日

《信报》刊载马妙华、黄蕙瑜写的《流亡生涯与民运前景——在东柏林访严家其》。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逃亡法国之前，也曾多次出国，那时总想在海外多留一些时间，但这一次的情况刚相反，总希望回到中国，因为人离开国家后，就失去了所有联系”。他说，流亡海外的许多人都出现适应上的困难，甚至沮丧、消沉，“我看到许多人写的诗，透过内心的痛苦”，他们适应外界的环境“很不容易”。

关于东欧的剧变与民运的前景，严家其说：“原来很多人还相信，只要打倒邓、李、杨集团，让少数人下台，中国还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发展。但是，东欧的变化使很多人的信念破灭了。6·4事件不是少数个人造成的，而是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我们相信，只有在中国实行非共产主义化才有希望”。他说：“我们的‘民主中国阵线’就是与共产党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我曾想过，到国外后不搞民运工作，只想写书。后来我也改变了看法，我觉得民运的事业是良心的事业，今天我参加民阵，是因为我觉得良心上是对的。我没有权利再停下来单讲理论”。

1990年5月4日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消息，说“民阵”、“民联”2日在东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三个方案：一、成立反对党委员会，起草党纲、党章等文件；二、通过“民阵”和“民联”合作方案，增加合作项目，在美国和欧洲联合办公；三、在适当的时候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推进组织合并。

1990年5月

香港《争鸣》杂志第五期刊载《刘宾雁谈民运路向》。刘宾雁说：“我来美国已快两年了，本想在海外补充一下人文科

学理论，把苏联、东欧的问题研究一下，因为88年3月时我已预感到中国要出事”。因此，“第一年，我就跑了4所美国的大学去演讲，总题目是《中国的危机与希望》。此外，我还写了几本书，第一本是我的自传，从一些侧面触及了中共40年的历史，这是应美国人的要求写的；第二本是Tel: The World，是关于89年民运的书，我和阮铭、徐刚合著。第三本是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集，谈中共的危机和希望，我在美国的言论和思想都包含在内了。关于我的政治态度，仍以历来的方式——写作——参与中国的民运”。

1990年5月7日

台湾《中国时报》刊载《激情过后，流亡精英分子何去何从——苏晓康对海外民运的省思》。苏晓康深深地感喟：大陆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在陌生的环境里搞民运，“真是很痛苦，老实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会搞运动”。他认为，要使中国未来发生变革，必须有三项条件交相运作才行：1. 地方强而中央弱；2. 体制外的反对党一定要成立；3. 体制内的改革力仍不可缺少。

另据英国“民运”组织刊物透露：最近民阵英国分部有人去巴黎总部回来后对“民阵”一些头头很有意见，认为他们“腐败透顶”，“如果严家其等人上台，中国一定会更糟”。此间观察家认为：“民运”组织之所以能在英国存在，同英国、台湾、香港一些组织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1990年5月8日

台湾《中国时报》刊登唐光华发自东柏林的一篇专访，题为《严家其：共产主义没有前途》。严说：“东欧的变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很大，特别是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认为共产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他说，“民

阵的目的是，希望在海外民主运动和国内反抗力量的压力下，借大陆经济上的困难，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影响，加速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分化。这个分化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开创一条道路，造成反对派、反对党的兴起，促成中国以和平的方式演变”

1990年5月11日

台湾《联合报》披露一则消息，说“民阵”主席严家其昨天在记者会上以“中华民国”来称呼他访问的土地。严家其说：“我在台湾的飞机上，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执政这么多年，是个事实，应以‘中华民国’来称呼。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错误，我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政府’。这不是制造两个中国，而是为缔造联邦制的中国创造前提条件”。

同日《香港时报》还刊登了严家其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香港前途问题。他说：“现在香港最重大的问题是北京的人大强行通过的‘基本法’”。他诬称香港基本法是“剥夺了香港人民政治自由的法律”。他煽动说，“香港人民今后重要的事是重新制定一部新的‘基本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九七基本法宪章’，要掀起一个长久的‘九七宪章’运动。”

台湾《联合报》同日还刊登了严家其的文章，题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文章说：“近一个半世纪前，一个国际性的，致力于推进社会变革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宣告成立。那时，共产主义还只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进入20世纪后，这个‘幽灵’迅速成长起来，开始侵袭世界”。在东欧、亚洲一些国家里，“共产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春以来，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太平洋西岸到加

加勒比海区的“皇冠”。

他
权，从
是，“
专政和
覆，在
认为，
生产引
义’的
会’，
渡的

于建
中山
个共
的策
国和
则并
‘复
共和
径，
国’
鼓吹
和’

加勒比海，共产主义体系正处于全面崩溃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因臭名昭著而不得不改名”，“戴上‘民主’的桂冠”。

他说：“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用暴力手段取得政权，从而凭借政权消灭私有制，从根本上改造全社会”。可是，“20世纪共产党国家的历史表明，正是在迷信暴力，实行专政和废除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点上，共产党专政体系的大厦，在经历了70年漫长的考验后，终于发出倾倒的巨响。”他认为，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人类有必要摆脱70余年来，依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摆脱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必然从‘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说教”。

1990年5月12日

台湾《中国时报》刊登严家其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国”》。严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共和国，即1912年的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和1949年的第二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民主共和的原则并不存在”。他说：“面对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前途既不是‘复兴第一共和国’，也不是通过‘一国两制’的手段用‘第二共和国’取代‘第一共和国’，中国的前途在于通过和平的途径，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第三共和国’”，即“带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国家才是最好的选择”。他鼓吹“海外的中国人，携起手来，在总结吸取‘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种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创造‘第三共和

国’——‘中华联邦共和国’作好准备”。并称“创造第三共和国的第一步就是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使专制政治变为民主政治”。

1990年5月14日

据纽约《世界日报》披露一则消息，海外主要中国大陆民运团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团结同盟”等，今天在纽约“中国之春”编辑部举行工作会议，就是否游说美国国会以取消对中国大陆的关税最惠国待遇一事，达成“有条件制裁”中共的共识。

会议发言人金岩石说：总的来讲，就是要求中共改善人权状况，是“有条件制裁”，不是“无条件取消”。

1990年5月16日

美国《民族》周刊杂志刊载《流亡的民主中国阵线使天安门希望破灭》。文章说：“流亡分子吾尔开希、严家其、陈一谔、万润南四人，曾被海外中国人看成是‘天安门烈士的合法继承人’，而由这些‘超级明星’领导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仅6个月，就受到不断出现的丑闻和内部分争的严重打击”。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民阵”进行了剖析：一、任人唯亲，独断专行；二、丑闻迭起；三、向台湾乞讨；四、梦想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

关于“民阵”的经济总纲，文章说：他们呼吁“发展市场经济”，选择的是资本主义。万润南曾公开地阐明了这一点：“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财产私有化，从而使中国出现一个中产阶级”。

文章还指出：“民阵”一些领导人还是大陆改革思想的官员时，就把台湾看成是大陆未来发展的模式。象陈一谔这样的改革者，6·4前就鼓吹“新权威主义”的概念，主张“自

由”的
开明
民党

亡巴
会中
说。
的萨
人，
分子
为独
与”
公民
传统
中

民主
民主

华
断，
话
联”
支

由”的经济只有通过一个开明的独裁者的指导才能实现，这个开明的独裁者维持着秩序和平衡利益集团的利益——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板。

1990年5月17日

《中国时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欧洲的专电，电文说：逃亡巴黎的中国作家苏晓康昨日在法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研讨会中，以《知识分子在89民运中的角色困惑》为题，发表演说。苏晓康说：“由于共产党的‘清污’和‘批自由化’，把中国的萨哈洛夫——方励之给逼了出来，使方励之，刘宾雁等人，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苏认为，面对中国的现实，知识分子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知识分子应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再搞超脱，不能再搞胡适的“不参与”及价值中立的想法；二、知识分子应做理性的代表，注重公民建设；三、应在中国现代化中借助传统资源，应突破对传统的解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道德勇气，这样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1990年5月21日

《香港时报》刊载《严家其离台谈话》。严家其说：“中国的民主应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事业，今后中国必定要走向民主、自由”。

1990年5月31日

《中国时报》刊登路透社一则消息，说位于香港、巴黎和华盛顿的三个主要的海外大陆民运组织，因内部派系斗争不断，正逐步失去群众支持的魅力。“民联”主席胡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三个大陆民运组织（“民联”、“民阵”和“港支联”）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权力关系。去年才成立的“港支联”，一向自认为是最有威信的组织，主要是因为他们成功

地帮助了数名民运人士潜逃出境；“民联”成立于1983年，历史最久，自办一个月刊，又有二千多名会员；“民阵”则是以大陆民运的流亡政府自居，目前他是人最多的一个组织。胡平说：虽然这三个民运组织的宗旨都是为了推进大陆的民主化，但是彼此间的关系不甚友好，仍有一些障碍必须清除。

1990年6月1日

香港《百姓》杂志刊载苏晓康写的《乱世无英雄——中共治下不出人才之原因》。苏晓康说：中国这个不死不活的传统社会又轮到一个循环末期而看不到转机的现象”，陷入“非常绝望的历史谷底”。苏晓康说：“中国要打破这个循环，就得孕育公民社会，由此产生现代政治家”，从苏联和东欧的历史过程来看，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形成”。

1990年6月2日

据法新社巴黎消息，“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此间宣布，民主中国阵线将发动一个争取释放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争取尊重中国人权的“世界运动”。万润南说：这个运动尤其要争取释放“北京之春”的七个领袖：王丹、王军涛、刘晓波、包遵信、陈子明、魏京生和任畹町。他说，为此“将成立一个法国、美国和日本‘律师团’以及一个专家委员会”。

万润南说：“民主中国阵线”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由于“在世界有十多个分部”，而成了“中国在海外的最大的政治组织”。

据新华社报道，在美国出版的亲台的中文报纸最近报道，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叛逃分子“6·4”前后将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搞一些反华反共活动。报道说：6月3日下午，这些叛逃分子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重建”“天安门民主大学”。

严家其担任“天安门民主大学美国分校名誉校长”，“民联”头头胡平任校长。

另据《香港时报》披露的消息，“民阵”在“6·4”周年的前夕，发表《国殇日周年告中国人民书》。

1990年6月3日

台湾《联合报》刊登陈一谔写的《中国：十年改革与89民运——北京6·4屠杀的背后》的第七章《民运与党内斗争》。

陈一谔说：“89民运和党内斗争是相互作用的”。但这次民运的失败，其教训有以下三点。首先，“学生与各阶层缺少有效的配合，党政机关内主张民主的改革派和社会各界的民主力量也缺少有效的配合”。

其次，“党内的改革力量与民众又缺少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学生没有给予党内改革力量的领导人以充分的支持”。

再次，赵紫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解决好从旧体制如何过渡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船”与“桥”的问题，更没有重视如何组织一支改革队伍问题。这是89民运失败的重要原因。

同日《联合报》还刊登严家其写的《改变世界史的40天》。严家其在文中说：“在学生绝食前，文艺界的人士，联合起草了一份《五月声明》，5月11日苏晓康、老鬼等人到我家谈这篇声明，我答应签字，并建议称其为《5·16声明》，使邓小平记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5·16通知》，以期引起人们对这篇声明的关注和重视”。他还说：“为了争取中国大陆的民主，今天，民主中国阵线致力的目标，就是要‘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为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反对党作思想、组织和人才的准备。民阵成立的目标，就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

台湾《中国时报》刊载杨漫克写的一篇题为《异域飘零身是客，灵根自植再开民运新机》的文章说，“4月下旬，‘民阵’、‘民联’在东柏林举行联席会议，双方人士在开诚的讨论中，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差别：‘民联’人士多已出国日久，落地生根，回国的愿望并不迫切；而‘民阵’人士则多没有客居西方的打算，认为大陆变局指日可待。因此根本未能做长期的计划或考虑，打算很快回国”。因此，“许多流亡人士也就得过且过，不思生计，也无法静下心来从事专业上的研究和经验的总结，而热衷于开会、演讲、四处搞民运活动”。“然未过多久，海外热潮迅即下降，加上海外的民运活动对国内影响有限，悲观情绪滋生。更由于民阵成立后不久即出现滑坡现象，不管在巴黎的难民营，还是纽约、波士顿，民运人士中的不安情绪与变态心理日甚一日，甚至造成矛盾重重，流言四起。侨胞也从对‘6·4’明星的崇拜，转而摇动不已”。

关于民运今后的发展问题，文章认为，他们已分别走上了三条不同的路向：(1)作为“职业政治家”，以“民阵”的流亡人士为代表，俗称“吃民运饭”。(2)走学术道路，以陈一谏、阮铭等人搞起的“中国当代研究中心”为代表。他们聚集了大批十年改革的参与者如张纲、李湘鲁、苏炜、朱嘉明等。这是美国对大陆未来的政治投资，花钱养一批有政治前途的“亲美派”。(3)读书求学，打入美国社会，以李碌、沈彤、辛苦等为代表。

文章说，这批大陆的海外政治流亡者，为了寻求财政支持，将成为美国、法国、台湾、香港，甚至苏联、德国在中国的代言人，也就是各国利益的代理者。文章认为，他们不仅会形成一个职业政治家阶层，还会形成代表各国利益的买办集团、高级间谍，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功能角色。

19
台
接受革
政治家
造成的
来解决
这样的
这是中
训可以
只有

玲及
席在
千多
学，
包
一

国
等

的
我

1990年6月4日

台湾《联合报》刊登苏晓康写的《不愿温和改革，只有被迫接受革命》的文章。苏晓康说：“中国的政治家也好，独裁者政治家也好，改革派的政治家也好，他们无法解决‘6·4’惨案造成的政治危机，一定要等到一个时代结束，才有另外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6·4’以后，出现了‘民阵’、‘民联’这样的政治组织，公开宣布要求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当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从这种历史教训可以看出来，一个统治王朝如果不愿意接受温和的改革，只有被迫接受革命”。而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990年6月5日

香港《明报》披露一则消息：两个月前才逃离中国的柴玲及其丈夫封从德，与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其，星期日出席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对面的草坪上举行的纪念活动，严向三千多名参加集会的群众发表演说，并在会上宣布成立民主大学，他本人担任该大学的名誉校长。严家其说，“要建立一个包括台湾、香港、西藏在内的共和国，首先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1990年6月10日

《香港时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马英九、严家其对话中国统一问题》。严家其说：“我赞成李登辉先生提出的政府对等的立场。”

1990年6月12日

香港《明报》报道，刘宾雁与其妻朱红表示挂念他在北京的儿孙，希望结束流亡生涯。他说：“中国的改革即将到来，我想回去亲身体会每一件事，即使我不能把它写出来”。

1990年6月13日

《香港时报》刊载一则消息，题为《共事前要相互坦诚彼此了解——章孝严谈海外民运与台关系》。消息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工委会主任章孝严，在‘6·4’天安门屠杀周年之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海外民运组织是一支重要之力量，与中华民国方之关系，希望有所突破”。章孝严表示“‘共事’之前，要建立‘共识’，获至‘共识’，则一定要相互坦诚，彼此了解”。对于大陆民运的工作和目标，章孝严说，“如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到中国大陆的内部，而仅将自己局限于海外发展，这可能是一项战略上的错误。”章还强调，“海外有一千份民运杂志在发行，远不如一份书刊在大陆内部秘密流传。”在谈到海外民运组织与台湾的关系时，章说，“目前在海外的大陆民运组织，已有860多个”，这些“组织虽然纷杂，但他们成立宗旨都极为相近，而绝大多数都是反对中共的一党专政，要求中共放弃‘四个坚持’，与执政党‘追求全中国的民主、均富、统一’的目标相吻合。所以，对他们的活动都应予以支持”。

1990年6月16日

据《香港时报》报道，总部设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预定今年9月，发表“民阵”白皮书，宣告民阵的大陆政策和努力方针。

民阵发言人金岩石说：“海外中国大陆民运组织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打起反对派的旗帜，反对中共的极权统治，在海外为中国的民主前途造势，并注意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发展；以及集中全力，作政策性研究，奠定将来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理论基础”。

1990年6月

香港《开放》杂志刊载虎波写的《中国需要赫鲁晓夫式的

此
民
接
华
，
。
有
发
份
在
大
立
要
自
二

人物——6·4周年访问万润南》。万润南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是其多元化，有了多元化，各种意见便能获得充分的表达，各方面的利益便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和平衡”。“因此，我们应该鼓励任何一种制度的良性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说一种制度的不存在或不可挽救便是另一种制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否则，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安全。”

万润南说：“苏共的变化实际上始于……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以及后来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我记得去年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一位苏联专家曾提过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你们要想真正改革，必须先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万说：“6·4屠杀的积极意义，显示了批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90年6月26日

《香港时报》报道，“民阵”理事杨中美，星期一在东京就“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境外联络总部”，以结合海内外民主力量，加速推翻中共一党专政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杨中美说：“‘革委会’是中共党内一秘密组织，成立于1976年。该组织‘境外总部’筹办人马泰，今年3月在东京和民阵代表进行会谈”。杨说，“经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三点共识：（1）结束中共反动派的一党专制，推进民主，健全法制，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2）‘革委会’和‘民阵’将在海内外，合作发展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宣传等活动；（3）双方尊重对方，以不同的策略和方式，推动民主化”。

消息说，马泰未出席记者会，但记者会上播放了他同民阵代表的谈话录音。他说，“‘革委会’从1976年成立以来，在党内培养了很多中国‘未来的戈尔巴乔夫’，去年6月4日以后，

“革委会”不再承认中共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开始以推翻这个不拥有合法执政资格的反动政权为己任，誓将夺回被中共反动派所窃取的权力，还政于民。”

(原载《当代思潮》第三、四、五、六期)

集
月
开
扉

丑闻层出不穷 内部纷争迭起

——美国《民族》周刊说“中国民阵”

问题多多

袁英婵、彼·克旺 翻译

去年9月，流亡在巴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运动领导人聚集在一起，举行成立中国民主阵线的仪式。然而，仅仅在6个月之后，这个阵线就受到各种丑闻和内部纷争的沉重打击。

巴黎的新闻界当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流亡的领导人吾尔开希、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身上。这4个人都是中国政府追捕的对象。

任人唯亲 独断专行

但是这个阵线甚至在成立之前问题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亲民主的活动分子指责这些阵线领导人亲手挑选代表，并且把早在海外建立亲民主运动的那些基层活动分子排斥在外。象陈军这样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阵线领导人并不信任他们不能控制的那些他们自己圈外的人。”

民阵领导人还在开幕式会议上未经讨论就草率地通过了他们的纲领，尤其是在秘书长负责控制所有财政和人事大权从而使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权力都落入秘书长之手的问题上，大家提出了保留意见。

丑闻迭起 舆论哗然

去年10月，一些关于吾尔开希的报道开始出现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谴责他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和滥用基金。吾尔开希花了3万多美元在波士顿建立他的办公室，并且没有说明他是如何用掉这笔钱的。这些指责促使民阵的监督委员会进行查帐，这个委员会披露，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民阵用掉了它所收到的56万美元捐款中的大部分，这些钱主要用在飞机票、豪华的旅馆设施、宴会以及其他有问题的开支上。

许多学生支持者非常气愤。一位学生说：“他们没有出版一份刊物，没有广播一个电台节目，也没有做类似的其他任何事情，然而50万美元已经花掉了。”

但是，难堪的丑闻继续出现。去年12月，万润南的助手胡明(译音)在海外中国学生的一再追问下承认，去年5月，他从美国回到北京，负责把5000美元的捐款现金交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但是他伪造了3位学生领导人收到这笔钱的签字。

之后不久，民阵委员会成员严江立(译音)也承认，他去年回中国执行同样使命时，也没有把1000美元交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今年1月，民阵的这些领导人利用台湾发出邀请访问这块反共飞地的机会来暂缓所有这些消极的报道和批评。此外，这次旅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补充金库的机会，因为在滥用捐款的丑闻披露之后，美籍华人社会几乎停止给他们提供捐款。另一个重要基金来源——香港受到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要它停止“支持颠覆活动”，而美国的公众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东欧和南非的事态发展上。

向台乞讨 出卖灵魂

天安门事件之后，台湾的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亲民主运动采取一种不大肆宣扬的做法，因为他们害怕激起自己家里的反对派。去年9月，国民党派遣它的前秘书长马树礼到美国各城市进行旋风式的旅行，以建立一些机构给“亲民主”的中国学生发放基金。

大约有50名大陆学生、作家和持不同政见领导人同民阵领导人一起应邀访问了台湾，他们在台湾的吃吃喝喝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开支。然而，这些组织与国民党都有密切的关系。

万润南和其他一些流亡领导人在台湾被吹捧为英雄。作为回报，万润南竭尽全力赞扬国民党的“民主经验”和它的经济奇迹。在访问结束时，这个阵线至少收到了15.3万美元的直接赠款。它还得到了台湾《联合报》的一项承诺，即为它在巴黎出版一份杂志提供资金。

据安排这次访问的《联合报》驻纽约记者孟先(译音)说，“众所周知，所有亲民主的重要组织的大部分基金都是来自台湾。”国民党期望它的慷慨得到的回报是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宣传价值——对此这些学生所起的作用比台湾政府能够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以及附带提高台湾的形象。

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

民阵的经济纲领总的来说是号召“发展市场经济”。万润南在纽约市立大学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比较公开地阐明民阵

赞成搞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民阵已表明它赞成台湾实行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当民阵领导人中的一些人还是大陆中国的官员时，他们就把台湾看成是明确的发展模式。象陈一谔这样的人甚至在“六·四”事件之前就鼓吹一种“新权威主义”概念，这种概念主张“自由”经济，只有通过一个开明的独裁者的指导才能实现——台湾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正是一个典型样板。

这些流亡领导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原始的”。民阵没有赢得亲民主运动的支持，这个运动现在已分裂成数十个组织。甚至在民阵内部，一个造反的团体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一个美国分部，向巴黎的总部提出了挑战。

(原载美国《民族》周刊)

“民主女神”号破产记

曹道明 编译

5月24日，“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组织者，在台湾基隆港、台北、东京和巴黎同时宣布，他们“被迫放弃广播计划”，“将在台湾卖掉这艘船以弥补开支，并把我们的船员尽快送回法国。”

5月25日，这些组织者又在东京和台北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台湾、日本、新加坡、香港和美国“屈服于中国压力”，使他们从公海向中国大陆进行广播的计划归于失败。

从3月17日开始，到5月25日结束，这艘由台湾和西方某些报刊出钱与中国“民阵”分子一起拼凑的海盗广播船，从大西洋航行8万海里，到达台湾，并未播发出一句话就宣告破产了。

一、“民主女神”号的出笼

去年秋天，叛离祖国的一些中国逃亡分子在巴黎组成一个叫做“民主中国阵线”的反动组织。不久它就面临着内外交困、财源匮乏的威胁。这时，法国《当代》周刊为扩大知名度，有意带头发起筹办广播船的行动。这一想法立即得到“民阵”一些人的积极支持。因为：第一，他们想以此向国内进行颠覆宣传，并改变民阵内部纷争和无所事事的局面，以求绝处

逢生；第二，发挥船的“商业”价值，募捐筹款，赚取实惠；第三，借此与西方新闻界和台湾密切关系，摆脱孤立困境。

去年年底，《当代周刊》和“民阵”经过积极串连，共凑集了19家西方和台湾报刊，开始了广播船的筹建工作，确定初步预算为150万美元。由劲头十足的台湾《联合报》系及《中国时报》系承担一半费用，其余由其它报刊集资。

一个名为世界医生组织的机构出面洽购了一艘搁置的英国海洋考察船。该船载重1200吨，长79米，1963年建造。购买这一旧船用去40万美元。由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提供14万美元，台湾“中央电视台”与《中国时报》各出13万美元。广播设备另外筹资购置。广播节目和录制由“民阵”一手操办。

广播船的策划者们决心要大赚一笔。商定凡上船采访的记者，一天须付费130美元。台湾三家电视台为获取电视转播权须付费23万美元。日本《朝日新闻》的采访付费为10万美元。另外，还举行“义卖”、捐款。完成广播计划后还可将船拍卖，换得100万美元之上。

今年3月9日，在法国西部拉罗谢尔港举行了命名仪式。吾尔开希、万润南、许天方以及早已定居法国的林希翎等人纷纷到场。

台湾两家电视台和“中央社”记者，以及法国几家报刊的记者也都与会捧场。

二、惴惴不安的航行

3月17日傍晚，法国西岸拉罗谢尔港寒风阵阵。涂有红、白二色的“民主女神”号悬挂拉丁美洲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国旗，起锚驶向外海。它将从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穿

苏
台
陆
室，
月1
吾尔
去。
者
时
动
的
直
们
留
的
特
说：
它能
浮现

断：
主机
控以
艇呼
船长
过，

苏伊士运河南下红海，经印度洋到新加坡入港补给后，直驶台湾海峡。预订4月20日左右在中国沿海海面开始对中国大陆播音。

今年3月，吾尔开希退掉以8万美元装备的波士顿办公室，飞到巴黎为“女神”号剪彩卖力，并扬言要随船前往。3月17日，当中国驻法使馆准备接待前来求见的三位法国人和吾尔开希时，他临时变卦，从使馆门前溜之大吉。

吾尔开希最后却没有上船，其他民阵成员也无人随船而去。上船的只有一名中国人，她是台湾《联合报》特派随船记者丘彦明。另有11名法国人，分别担任船长和船员。这些临时招募的法国人，多为拉罗谢尔港失业工人。他们怀着各种动机上船，有人欲借机漫游大海，探访充满传奇色彩和黄金的东方；有人期待着名、利双收的英雄称号。在最初几天，直布罗陀的碧水、摩洛哥的青峦以及西班牙的秀峰，曾使他们留连赞叹。这些普通的法国人虽不谙此行的含意，但此船的特殊“使命”总无法平复他们心中的忧惧。大副赛西尔私下说：“我看，‘女神’号这次出航十分危险。我甚至没有把握它能否达到目的。”船长也预感此行不会顺利，常说他眼前总浮现着妻子送别时忐忑不安的容颜。

的确，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这只老船，惊恐一直迭起不断：午夜，接连5次火警虚报，吓得人人一身冷汗。接着，主机房出事、油机筒炸裂、驾驶舱自动引航器损毁、油压失控以及马达出现问题等等。

还有，途经利比亚沿海时，利比亚战斗机出动监视、舰艇呼啸海面。船至苏伊士运河，被13艘小船围困了40小时。船长自知“女神”号负有“政治使命”，并非商船，为求顺利通过，慷慨解囊，送出两万美元、80条香烟和各种礼品后才终

于通过。行至吉布提，问题百出，因各种“技术和行政原因”，耽搁数日。船员乔治以妻子产期将近，需要照顾为由，弃船而归。4月12日，“女神”号进入印度洋后，飓风骤起，一连数日，遭巨浪包围袭击，以致电讯联络中断，与巴黎总部失去联系。于是船长决定更改航线，暂弃马六甲海峡，绕道印度尼西亚从雅加达以北，转上新加坡。行程拖延9天，使陆地上的策划者们心急如焚，尤如热锅蚂蚁。

《联合报》记者丘彦明4月19日日记对船上的紧张心态做了如下记载：“大副赛西尔在黑暗中招呼我，并说，‘有个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怕又会增加紧张气氛。昨天傍晚，我发现一艘船在‘女神’左侧尾随不放，心想大事不妙，立即改变航道。可是不管往哪个方向驶，那船都跟着，而且有逐渐逼近之势，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我当时想——完了，大概是我的末日到了。幸亏，最后证明是艘渔船。捕了鱼走了。吓得我虚惊一场’”。

“女神”号的“政治使命”，使船上的人个个失去了安全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后又连续出现所谓哨艇、潜艇、水雷等等自扰的虚惊。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惴惴不安的航行。

三、南海风波

5月2日，“民主女神”号经过46天航行，历经飓风暴雨袭击之后，自由港新加坡遥遥在望。船上11个疲惫不堪的人兴奋异常，换装准备接受欢迎。然而，事态有变，新加坡当局态度十分冷淡，下令“女神”号不得进入内港，补给由小艇往返运送，船员一律不准离船。嘈杂声中，传来《联合报》总部命令，要随船记者迅即下船，返回台湾，接着，该报总编

辑又直接
补给及停
来。”原
和丹麦的
这样
了12个小
哀叹之声
划者和活
4月
播非法行
讲话，个
均应制
公海区
的人和
欧
4
纳先生
在公海
的，并
美
盟的规
在
骤变。
位。海
1959年
土之外
盗”广

辑又直接用无线电话告诉惊讶的记者：“现在，这条船在台湾补给及停靠 都有争议，未来发展不可估计，请立即弃船归来。”原先争相赶来登船的100多名记者，也只有法国、日本和丹麦的9人自愿上船。

这样，等待休整的“女神”号仅仅获准在新加坡外港停留了12个小时。便于5月3日凌晨向南海深处驶去了。甲板上，哀叹之声阵阵。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向“女神”号、它的策划者和活动基地袭来。这就是国际舆论。

4月下旬，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发表了题为《公海广播非法行为》的文章；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丘宏达发表讲话，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第109条规定，所有国家均应制止在公海从事未经许可之广播。如果“民主女神”号在公海区域对中国大陆广播，中国可以逮捕这些从事广播行为的人和船。

欧洲报界也发出对“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同样指责。

4月29日，北京新华社报道，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塔干纳先生已向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表示：企图在公海进行反对中国政府的广播活动之“民主女神”号是非法的，并已电告该船注册国追查报告。

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3日报道，美国确认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已告诫台湾小心行事，勿使国际关系恶化。

在这段时间，海峡彼岸的“女神”号大本营——台湾风云骤变。民间、学者、报刊和政客们都大谈“女神”号的非法地位。海洋研究所教授黄异指出：除1982年国际海洋公约之外，1959年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和1965年欧洲关于防止从一国领土之外从事电台广播的协定皆明文指出，禁止非法的“海盜”广播行为。黄异建议，台湾当局不宜涉入“女神”号广

播计划，民间人士也不应上船参加，以免落人口实，引发争论。

在4月29日，新华社第一次就“民主女神号”海盗广播船事对外发表新闻指出，台湾当局口口声声要缓和两岸关系，但行动上却支持叛乱分子到大陆沿海进行颠覆宣传，是公开的挑衅。此后，台湾“行政院”于4月30日召集国民党中央“陆工会”、“海工会”、“安全局”、“国防部”和“外交部”负责人紧急磋商。多数意见主张以大局为重，台湾不宜介入“民主女神”号的广播。在此前后，台湾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章孝严、“陆工会”执行秘书马英九以及“新闻局”局长邵玉铭等已在改变腔调。马英九说：“女神”号在东海广播，牵涉法律问题，“政府”不会介入。邵玉铭称：台湾尊重它签了字的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不介入“民主女神”号广播活动。

台湾的变化犹如晴天霹雳，使“民主女神”号受到重大打击，于是决定：暂驶往香港，然后再去台湾。

南海海面，东去的“女神”号从新加坡出发后不久，便失去了与陆地的通讯联系……。

四、香港拒绝停靠

5月3日清晨，“民主女神”号驶离新加坡，太阳从海面跃出：金色的云，蓝色的天，南海美丽而平静。但是，船上的20个人，由于世界舆论对广播船的非议和台湾大本营风云突变，几天来心潮汹涌，无法平静。一位随船记者在日记中写道：“整日，大家的话题都围绕着台湾的态度和船抵台湾后的情势打转。情况每分钟都在变化。……大家听到的仍是一个月前前的协定。而今天由于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巧妙转变，

台湾对
事？又
在
一阵闷
定的气
纷就此
不能毫
“民主
活动”、
香港政
支持的
香
决定：
5
确保香
船进港
不予批
接
香港水
能性。
香
对“女
接待后
入基隆
神”号
一
断绝了

台湾对这艘船的态度也变化极大。真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又将发生什么事？”去香港，香港又会怎样？

在香港，“女神”号突变航线，请求来港停靠的消息，像一阵闷雷在天空炸响。香港“基本法”不久前刚刚通过，和平安定的气氛正在人心弥漫，不料忽然又起事端。香港舆论界纷纷就此事发表评论，譬如：“香港虽然是自由港，但自由也不能毫无限度地去容许利用来作为反对一国政府的跳板”、“‘民主女神’号纯属‘海盗电台’，当然不应承认和支持它的活动”、“香港人的爱国热情不容玷污，不应受人利用。因此，香港政府不准‘民主女神’号来港，才是明智和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

香港当局出于对香港局面稳定和中英关系的考虑，作出决定：拒绝“女神”号入港。

5月3日，香港总督卫奕信发表声明：“我们的政策是确保香港不被用作他人进行政治斗争的战场。如果允许这种船进港，与上述政策是不相容的。它们要求进入香港，港府不予批准。”

接着，香港海事处长施祖祥宣布：“如果‘女神’号强闯香港水域，将不排除要求水警协助拦截及采取强硬行动的可能性。”

香港当局斩钉截铁的态度，得到各界热烈拥护。但是，对“女神”号来说，却像一只备受威胁的过街老鼠。香港拒绝接待后，台湾表示“可依人道精神，国际惯例”准许“女神”号入基隆港补给，但“官方不会介入该船之活动”。于是，“女神”号转驶台湾基隆。

一路驶来，“女神”号或出于保密考虑或因通讯设备失灵，断绝了与陆地联系。

5月9日，它已航行一万海里。右面是菲律宾，左面是中国大陆。由于大部分船员以前只会捕鱼，从未受过航海训练，所有的人帮助操作，每天轮流在驾驶舱用望远镜瞭望海面，虚惊接踵而至。

这一天，台湾“国防部”有惊人发现，说是在台湾鹅銮鼻西南附近海域出现一艘“不明潜艇”。这一消息使已来到台湾海面的“女神”号刚刚放松的神经，忽又紧张起来……。

“不明潜艇”之说，使台湾舆论大哗。各种议论和猜测几乎占据所有报纸版面。随后逐渐推出“专家意见”，“潜艇如果属实，大陆对‘女神号’不致动武，而有对当局警告的味道”，“政府对目前难局，在因应上要非常小心，不可孤注一掷”，“专家建议，台湾最好一切按国际惯例处理，完全不能涉入协助‘民主女神’号，才可避免海峡两岸关系发生莫测”。

台湾当局虽发出潜艇出现的惊人消息，但并不显慌张失措，倒是把“女神”号吓了一跳。有人认为：国民党在为修改对广播船的政策制造舆论，才“跳”出了一艘“不明潜艇”来。

5月11日，“女神”号在惊魂未定中继续北上，不久，透过云雾，浮现出淡蓝色延绵不断的中央山脉峰顶。台湾南部的苏澳港到了。

五、几经周折驶入基隆港

5月10日，在海上漂流54天的老船“女神”号驶到了南海尽头。但它没有朝台湾海峡驶去，而是向东穿过巴士海峡，从太平洋边上进入台湾岛东部沿海。下午2时40分，一架标有国民党“政府”标志的军用飞机从甲板上掠过。此刻，“女神”号才真正感到了“安全”，神经终于放松下来。然而，一

波刚平一
为不利自
船七

知道台
湾当局
并允许

也可能
6时30分
系后，“

基隆港，
5月

它贸然
港申请

这

显得格
靠基隆

料、食品
乞讨求

界给予
仅一点

报界透
播音员

天内找
——广

岂米

规则之
于水面

赴川
每
鼻
弯
几
如
,
,
入
失
改
透
湾
海
,
标
女
一

波刚平一波又起。船上记者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对“女神”号极为不利的消息。

船长法国人尼克得知内容后一下子楞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台湾当局宣布“女神”号在公海进行广播属不法行为，台湾当局将不予支持，但可依法向基隆港提出申请，准予靠岸并允许补给。这位30多岁的船长称，“台湾政府可能搞错了，也可能是误会”。他实在不懂台湾当局为什么会这么说。晚上6时30分，与焦急等候的“中国之船”协会台湾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女神”号开足马力，以每小时10至15海里的速度驶向基隆港，预计三四小时后就可进入基隆港海域。

5月11日，焦急的“女神”号万万没有料到台湾当局不准它贸然进入基隆港，必须由受托的民间祥和船务公司办好进港申请手续，于是只好在花瓶屿外海停泊等待。

这几天来，早于4月初就飞到台湾的“民阵”成员许天方显得格外“忙碌”。5月11日，他被迫宣布“‘民主女神’号停靠基隆港只是单纯地为了补给，没有其它目的。一旦补充燃料、食品和水之后，就立即离港”。与此同时，许天方到处乞讨求助。他哀叹“‘民主女神’号经费严重缺乏，希望企业界给予大力支持。但是迄今并未有一家企业表示予以支援，仅一点零星的捐款和义卖所得，与需求相差甚远。”他还向报界透露，由于该船的播音员未能来到台湾，而台湾的专业播音员竟没有一个表示愿意上船代劳，希望大家帮助在一两天内找到播音人。其实，许天方心里最急的是这条船的“心脏”——广播发射器，迄今还没头绪。

岂料，台湾“交通部长”张建邦宣布：“依照台湾无线电规则之规定，在台湾领土之内的船舶、航空器或其它任何浮于水面或空中之物体上，设立及使用广播电台概予禁止。因

此，‘民主女神’号不得在台湾领海内广播，至于禁止它在公海广播则是为了遵循1982年国际公约之规定。只要‘民主女神’号之广播干扰了台湾电波之传递，当可禁止其广播。”张还宣布：“若‘民主女神’号违反禁止在公海广播之规定，将不允许它在台湾进行第二次补给。”

接着，等待热烈欢迎的20名船上人员又听到台“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朱永荃宣布，目前“民主女神”号被视为“货轮”，岸上人员欲登轮必须符合两项条件：一、具有合格的出境文件；二、船上条件允许。现已认定，“民主女神”号有12个客舱舱位，已有9名记者在船上，因此，只能准许3人登船。

直至13日上午8时44分，在海上漂行57天、航程二万公里之“女神”号，在基隆港外等候48小时之后，终于摇摇晃晃驶进了基隆港，在东三码头靠了岸。

码头上集聚着一些“欢迎”的人群。一个叫“反共复国协会”的组织拉开了表示欢迎的大布条。放了一挂鞭炮之后，安排好的学生乐队奏起欢迎曲。“民阵”主席严家其和“中国之船协会”副理事长许天方等来到基隆港时，立即引起一阵骚动。“女神”号的人员集聚甲板，但是，在闹哄哄的人群中，他们却不曾看到促成这次艰难旅程的主人——台湾的官员们和“民阵”主席严家其，官员们拒不出面，严家其也被拒之码头之外了。

六、严家其泪洒台北

正当举世注目“女神”号的时候，中国大陆通缉犯、“民阵”主席严家其于5月7日抵达台北机场。

本来，台湾与“民阵”的关系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今年

一月，“民阵”秘书长万润南等人到台湾时，备受欢迎，“女神”号的“秘密协议”就是双方合作的结果。而这次身为“民阵”主席的严家其的到来，却冷冷清清，起初连报界都不知道。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情况就如此大变。当初这里有人说过：“只要你们踏踏实实、做实质性的工作，把项目报上来，别说五千万，就是一亿也拿得出”。

而今，耳边响的却是“不介入”和“应当遵守国际公约”等等。严家其虽心中不是滋味，却一直绞尽脑汁妄图挽回局势。

三天后，他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惊人讲话”：“我在飞机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执政这么多年，是个事实，所以，应以‘中华民国’来称呼。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错误。我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接着，严家其对中国大陆大肆攻击了一番。

5月12日上午，严家其拜见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章孝严。他踏进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后便说：“我此次来，最主要的是为欢迎‘民主女神’号进港，上船向船员致敬并表示欢迎。”不料，章孝严立即回答：“我认为台湾政府与执政党虽未介入‘民主女神’号行动，但却有责任考虑海峡两岸情势的稳定。二千万同胞的安定也有责任要放在评估的因素之内。”这使他搞不清楚是同意他上船，还是不同意？

当天，严家其、许天方就通过“女神”号代理行祥和船务公司提出申请，但申请书送到基隆港警察所后，就被安全检查人员将严、许的名字一笔抹掉。到了中午下班时，几经交涉仍不成功。后来港警所说，13日上午严、许还可以来申请，“届时随到随办，回去吧！”

13日上午8时，“女神”号还未近港，严、许二人就把护

照送到基隆港，申请办理登轮手续。但港警所长李德明明确表示严、许不得进入港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入港？李德明沉默不语。后来李把这人拉到一边，轻声地说：“你很清楚，不必问我。”那人又问：“你是奉命行事？”李笑而不语。船已到达多时，严、许二人还在港警所里与人纠缠、乞求。

三天之后，严家其被准许从侧门进入码头，登上了被台湾警察24小时监视的“女神”号。

严家其等人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可是，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为“女神”号播音的六个人因台湾拒绝发给入境签证而不能登船，其中之一就是吾尔开希。百般活动，广播发射器仍拿不到手，自从广播船3月17日下水以来，为搞这项计划已经负债90多万美元。台湾许诺的财政支援并未兑现。

国际舆论迫使台湾当局最后把“女神”号置于进退两难之地。同时，“女神”号内部也矛盾迭起，陷于瘫痪状态。

5月18日，被台湾当局当做棋子拨弄的“民阵”主席严家其不得不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原订赴中国东海广播的计划被迫暂时中止，“女神”号要转赴日本求援。

此时，严家其百感交集，痛苦难奈，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上百名中外记者哭了起来，语不成声，无法再说下去……

七、日本拒绝闹剧告终

“女神”号在国际舆论谴责下，四处碰壁后并不死心，决心孤注一掷改去日本求援，操办广播器材。于是，该船组织者兼发言人法国人杜邦飞往东京活动。

清
明：如
在弄清
神”号
两天之
电信取
本还宣
段。日
本就特
为，应
过
计可放
在
播计划
在
法律责
采访由
从新加
用。
5
织和计
汉”；
阔绰的
剧”。
“这个
样”。
他说：

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官房长官坂本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如果“民主女神”号果真提出要到日本港口停泊，日本将在弄清楚它的目的之后，决定是否准许入港。这番话使“女神”号感到是一种“十分明确的暗示”：日本不会同意。果然，两天之后，日本正式宣布，在公海上通过船舶广播，是国际电信联盟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因而该船是不受欢迎的。日本还宣布，为防止违反国际法行为，日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日宣布：“女神”号一旦驶出台湾，日本就将在公海监视其行动。如果弄清它有进行海盗广播的行为，应认为可以行使武力驱赶。

这样，“女神”号在过街老鼠到处喊打的情况下，终于无计可施，走投无路了。

在台湾的这些日子，“民阵”成员如坐针毡。对大陆的广播计划不能实现就意味着政治上的重大挫败。

在经济上，黄粱美梦变成了债务累累，还面临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窘境。原来准备捐款的单位拒绝出钱，原来争相采访的各国记者纷纷指责“女神”号计划“根本是一个骗局”。从新加坡上船的路透社记者在深感失望之余决定拒付采访费用。

5月15日，一家报纸给“女神”号列出五大特点：一、组织和计划都是草率无章的“把戏”；二、是十足的“国际流浪汉”；三、是一只彻头彻尾的“纸老虎”；四、成员都是出手阔绰的花花公子；五、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出“骗加闹的混合剧”。台湾《中时晚报》报道，“女神”号一“高级人员”承认，“这个船根本没有组织、也无所谓规章，和乌合之众没有两样”。台湾一位工人对西方一些人参与“女神”号十分气愤。他说：“为什么法国人干预中国人的事务？如果这种干涉遇

到困难，任何真正爱国的中国人都应当感到高兴。我希望中国用鱼雷袭击这条船！”

5月24、25日，绝望的“女神”号组织者终于分别在巴黎总部、东京和台北、基隆宣布放弃广播计划并指责台湾、日本等的“背叛”行为。至此，一场反华闹剧，在一片倒彩声中落幕了。

“女神”号用去数十万美元，在凄风苦雨中行驶59天，绕了多半个地球，但并未能发出一个字来。宣告破产的“女神”号，终于进入了拍卖市场，等待买主。

(原载1990年5月29日—6月4日《参考消息》)

“民主女神”号海盗广播船惨败记

·董 斌·

由一小撮人策划的反华闹剧——“民主女神”号海盗广播船，从3月17日启航到5月25日哀叹惨败，没有播发一句话就“胎死腹中”，被迫宣告收场。

筹建这艘广播船的骨干是：法国的《当代周刊》和去年秋天叛离祖国的一小撮中国逃亡分子在巴黎拼凑的“民主中国阵线”。

今年年初，策划者们买到一艘被搁置的英国海洋考察船。买船的40万美元由台湾的一家组织、一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社支付。策划者们打算再筹资购买广播装置；而广播节目和录制则由“民阵”负责。

3月9日，在法国西部拉罗谢尔港，“女神”号举行了命名仪式。“民阵”的头面人物吾尔开希、万润南、许天方等到场祝贺。3月17日晚，“女神”号从拉罗谢尔港起锚远航。扬言要随船的吾尔开希最后并未上船；其他“民阵”分子也没有随船出海。上船的中国人只有台湾《联合报》记者丘彦明。另有11名法国人，分别担任船长和船员。策划者的如意算盘是，“女神”号能顺利经过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和印度洋，到新加坡停港补给，然后驶向台湾，在台湾增加补给和安装广播设备后，于4月20日左右在中国沿海的公海，对中国大陆搞反华播音。

“女神”号出发不久，在地中海经利比亚沿海时，利比亚战斗机就在空中对它严密监视，四周舰艇呼啸，海面发出警告。“女神”号行至苏伊士运河，被13艘船只围困了约40个小时。好不容易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又在吉布提港附近被搁浅了好几天。4月12日进入印度洋后，破旧的“女神”号碰上了一连数日的飓风恶浪，闹得电讯联络中断，同巴黎总部失去联系。这时船长临时决定改变航线，不走马六甲海峡，而绕道印度尼西亚，再北上新加坡。这样一来行程拖延9天。这9天，船上人员胆战心惊，疑心有船尾追跟踪，害怕被潜艇、水雷击沉；陆地上的策划者们则忧心如焚，唯恐“女神”号船沉人亡，一切化为泡影。

5月2日，经过46天的艰难航行，“女神”号驶近新加坡沿海。船上的人员满以为在新加坡会受到欢迎并可停下来进行休整。不料新加坡当局的态度十分冷淡：一方面下令“女神”号不得进入内港，船员一律不准离船，同时只允许船在外港停留12小时，所需补给一律由小艇运送。在一片悲叹声中，又传来了台湾《联合报》一个不祥的命令：要该报随船记者立即弃船返台，因为“这条船在台湾补给及停靠都有争议”。原先争相赶到新加坡登船的100多名记者也开始犹豫起来，最后上船的只有法国、日本和丹麦的9名记者。

5月3日凌晨，“女神”号灰溜溜地离开了新加坡外港，打算到“自由港”香港停留。但“女神”号申请到香港停靠的消息，马上激起香港公众舆论的愤怒谴责。人们指出，“‘女神’号纯属‘海盗电台’，这里当然不应支持它的活动。”香港当局出于香港局面稳定和中英关系的考虑，5月3日由香港总督出面发表声明，不允许“女神”号入港。香港海事处负责人同日还宣布，“如‘女神’号闯进香港水域，将不排除要求水

警协助拦截及采取强硬行动的可能性。’

形单影只、惊魂未定的“女神”号只好在海上继续飘泊。5月10日，船驶近台湾东部沿海。他们原以为到台湾就有了靠山。但随船记者收听到的一则广播如兜头冷水：台湾当局认为，“女神”号在公海上进行广播属于不法行为，因此不予支持；但此船可依法向基隆港提出申请，准予靠岸并允许补给。

经过申请和几番交涉，在海上飘泊57天的“女神”号终于在5月13日上午摇摇晃晃驶进基隆港的东码头。早在5月7日就飞到台湾的叛逃“精英”、“民阵”主席严家其，准备欢迎到基隆港的“女神”号，但当天却被阻挡在码头之外。经过多次乞求，三天后才被允准从码头侧门登上了被警察监视的“女神”号。更使严家其之流丢脸的是，为“女神”号播音的6个人（其中包括吾尔开希）因台湾当局拒发签证而不能登船。5月18日，严家其泪洒台北，面对100多名记者泣不成声，宣布原定中国东海广播计划“暂时中止”，“女神”号要转赴日本求援。

然而，严家其一厢情愿的“请求”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5月23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宣布，“女神”号一旦驶出台湾，日本就将在公海监视其行动。如弄清它有进行海盗广播行为，“应认为可以行使武力驱赶”。

“女神”号的策划者们，在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嘲笑声中，被迫于5月24日和25日分别在巴黎、东京和台北、基隆宣布，要拍卖这艘旧船并放弃“广播”计划。这就是一小撮反华分子的应有下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原载1990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

乌呼哀哉，装神弄鬼的“女神”！

·魏 巍·

在新闻媒介中很喧闹了一阵子的“民主女神”号，现已寿终正寝销声匿迹了。“女神”为何落到这般田地，其原因在哪里呢？我看真实的原因除了失道寡助这根本的一条之外，再就是“女神”的组织者严家其等人水平太低。他们的头脑里主观唯心观念根深蒂固，干事情全凭一厢情愿，根本不考虑客观实际。比如这次“女神”号出动之前，他们为什么就不想想：美国也罢，香港、台湾也罢，日本也罢，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为什么要替几个叛逃在外的可怜虫火中取栗呢？单从这一点看，所谓“精英”云云，恐怕是打点儿折扣了。

“女神”号的惨败，在我看决不会是最后一次。等待他们的还会有一连串的失败。因为他们整个的计划，都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去年北京风波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错觉。他们认为那么多人上街，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也要垮台了，似乎人们不再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了。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也说明这些“精英”平时就不接近群众，他们尤其不了解工农大众的情绪。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有没有不满情绪呢？有。他们的不满主要是：对物价上涨感到难以承受；对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感到不满；对按劳取酬遭到破坏带来的分配不公有意见。他们希望并要求党和政府对这些方面能够加以改进。从内心里

说，他们绝不是要共产党下台，更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这一点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懂得更深。因为他们是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懂得的。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那些醉心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应声虫们，看到群众不满，便以为群众同意他们的主张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北京风波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对群众的意见，自然要认真地听取，并且要不遗余力地去改进。平暴一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各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使得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是高兴和满意的。这样也就缩小了那些资本主义复辟者和一切野心家活动的地盘。今后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装神弄鬼的女妖，也就通通不在话下了。

(原载6月5日《光明日报》此篇有删节)

妄图颠覆中国政府遭到海内外舆论谴责

“民主女神”号海盗广播计划破产

该船将被“当作一艘货船”拍卖掉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七日电 据外电报道，由台湾和海外反动势力一手策划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企图在公海对我国大陆进行旨在颠覆我国政府的海盗广播活动，已被迫取消。这一非法广播活动的台前人物于二十五日在台北和东京两地宣布，目前停留在台湾基隆港的这条船将被“当作一艘货船”拍卖掉。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是由台湾、法国等地一些新闻机构临时组成的所谓“中国之船协会”购置的一艘一千二百吨的旧勘探船改装成的。据台湾报纸报道，购置这艘船的四十万美元，是台湾的几个机构提供的，台湾方面并允诺这艘船驶抵台湾后为它提供广播设备。叛国外逃的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等为这艘船准备了以煽动颠覆中国政府为内容的广播节目，并声称将在船驶抵中国沿海时登船活动。但是一开始就有海外舆论指出，在公海进行广播违反了联合国海岸公约和国际电信联盟的有关规定，是一种应当受到严厉惩处的海盗行为。

据报道，这艘船于三月十七日从法国的拉罗谢尔港起航后，由于它的非法目的而在沿途停靠各国时“成了得履行特

别繁缛的行政手续的对象”。在吉布提时，这艘船因“各种技术和行政原因”在港口停留了好几天。五月初这艘船到达新加坡，有几名台湾和外国记者登船准备随船报道。船离新加坡后表示要驶向香港，香港当局明确表示，由于这艘船的目的与香港的政策不符，“民主女神”号不得入港。这艘船随即驶向台湾。

由于国际舆论的影响，台湾当局曾力图洗刷它同“民主女神”号的关系，声称它“绝对没有参与、介入或支持广播船航行和整个广播活动”。它“不能支持任何船只在公海上作未经许可的广播”。台湾当局又声称，对这一广播计划“政府”不宜出面，但“不反对民间声援”，很快它就同意这艘船停靠基隆港“进行补给”。五月十三日，这艘船停泊基隆港，正在台湾活动的严家其和台湾一些人到码头欢迎，严家其后来并登船“慰问”船员。与此同时，台湾岛内外不断出现主张谨慎对待“民主女神”号违法活动的舆论。不少人在谴责这一海盗行径时指出，如果这艘船胆敢在公海进行广播，依据有关国际法，中国有权对它采取严厉措施。慑于这一情况，严家其、吾尔开希等表示，包括他们在内的“民阵”分子都不登船活动。台湾当局也改口说，如这艘船贸然进行广播，将不允许它再次进入台湾的港口补充给养。台湾有关单位也取消了向这艘船提供广播器材的承诺。这艘海盗广播船随即策划驶到日本购置广播器材。日本政府明确表示，由于广播船违反国际法，在日本将不受欢迎，并表示如这艘船驶来日本，日方“对靠岸和有关人员登陆将采取严厉措施”。这样，这场由海外敌对势力精心策划的反华闹剧在上演两个月后，不得不宣告结束。

有台湾报纸报道，随着这一旨在颠覆中国政府的宣传活

动的破产，活动的策划者“中国之船协会”和叛逃国外的“民阵”分子对活动未能像预期的那样为他们“赚进大笔利润”而“深感失望”。据报道，从新加坡上船采访的记者每人每天需付给这艘船一百三十美元，台湾三家电视台为获取画面付了二十三万美元，日本一家报纸也已付十万美元左右，活动的策划者还通过拍卖衣服等途径“赚进”了一笔钱。非法广播活动破产后，一些新闻机构指责这“根本是一个骗局”，有的西方记者还决定拒付上船后的采访费用，“觉得上当受骗的心情可见一斑”。

(原载1990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

“精英”卖“女神”

· 舜 之 ·

在我们这个世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幻，总会有那么一些冒充“英雄”、“领袖”的小丑、骗子、投机者、野心家，突然从阴暗角落里跳出来表演一番。那个擅长“投掷‘炸弹’的学者”严家其、自称“不是一块读书的料”的吾尔开希、自封为“石头”军头领的万润南和自封为“改革”理论家的陈一谔之流，就都是这类可恶可悲的角色。

且不说他们去年春夏间在北京的疯狂表演和所干的罪恶勾当，只看他们叛逃海外之后的种种叛卖活动和十足的政治流氓行径，就可知此辈背叛祖国的狂劲，出卖灵魂的热劲，已达到何等惊人的地步了。

去年9月间，这一小撮被国家通缉的外逃罪犯，在洋主子的纵容和默许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凑足百把人，在巴黎成立了反动组织“民阵”，严家其一伙即进行了以盗用《人民日报》报头，刊登“民阵”反华反共“倡议书”和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杰作”的“第一战役”。这种表演，充分暴露了这伙人造谣行骗的丑恶嘴脸，引起海外正直人士的不满和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这些“谣言世家的子弟”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正是他们所要运用的“战术”。经此一“役”，人们已经看到，严家其、吾尔开希一伙，就像《伊索寓言》中那伙抢走赫耳墨斯的车子里装载的说谎、欺骗、

诈虚的人一样，都是嘴里没有真话的说谎者和骗子，无不对之嗤之以鼻。

今年，为了摆脱困境，以求绝路逢生，在洋主子的策划下，他们又别出新招，搞了个什么“中国之船协会”，花了40万美元从英国买来一艘破漏的旧船，改装成电台广播船，命名曰“民主女神号”。有了这艘破漏的旧船，这伙在国外被称为“政治乞丐”的动乱“精英”，不仅又可重施造谣、咒骂的故伎，以发泄他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满腔仇恨，还可借行骗之机赚一笔美元，以供他们豪华的流亡生活之用，自然“无不欢呼雀跃”，绞尽脑汁，把这艘搁置二十多年的船精心打扮一番。他们在甲板前半部用红白两种颜色画上“女神”半身像，甲板后半部则衬以10幅现代派画，并以蓝色油漆写着“民主女神号”五个中国字。船头还树立一座高2.9米的木雕白色“女神”像，使船上充满“女神”气氛，用心可谓良苦矣！

据说，为了配合这艘广播船的反华反共宣传活动，他们还计划开展会议、讲座、“全球性请愿”、“义卖”T恤等活动，以制造气氛，“加强”对中国的“国际压力”。看样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战役”。难怪被讥为“空中飞人”的吾尔开希要退掉在波士顿以8万美元装备的“办公室”，飞去巴黎为“女神”号剪彩。聚集在巴黎的一批外逃犯，则几乎是倾巢而出，齐集拉罗谢尔港，跪倒在“女神”脚下，表决心，示忠诚，造声势，壮行色。这伙人大概以为，有“女神”庇护，船上悬挂外国旗，此行定会船到功成，一扫哥儿们的悲观绝望情绪，重获其反动主子的见重。因此，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不仅事先录制了反动宣传的广播节目，还决定船到台湾时，即上船参加反革命宣传活动。

不过，严家其辈这回又是弄巧成拙，“美”梦破灭。他们

原想指靠“女神”庇护，却把她变成万恶的女海盗。所谓“女神”号广播船刚起锚离开法国港口，就被国际舆论斥之为海盗广播船，一路受抵制，到处遭谴责，船到台湾即“搁浅”，所谓“反共复国的基地”也无力救援，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被迫”放弃广播计划，叛国“精英”们悲悲戚戚地又一次尝到“战役”惨败的痛楚，在“深感失望”之余，只好“将以拍卖形式”卖掉“女神”，捞点路费，打发船员回老家。看来，这出由逃犯自编、自演、自拆台的丑剧，大概就以“精英”卖“女神”的惨淡场面了结吧。

如果把这出刚开台就演不下去的丑剧，看作他们的又一次“战役”的话（也许可说是“第二战役”），那么，成立不到8个月的反华反革命组织“民阵”，已经“发动”两次所谓“战役”了。“第一战役”使他们在世界人民面前，显出说谎者和骗子的丑态。“第二战役”则充分显出严家其之流，其实是一伙无法无天之徒和顽固反动分子的真面目。想当初，他们在我国首都作乱时，除了高喊“民主”、“自由”之外，无不开口“法治”、闭口“法治”，却把国家的法律踩在脚下，这回又置国际公认的有关公约、协定和规定于脑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干着从一国之外从事颠覆活动的非法海盗广播活动。他们用自己的丑恶行为向世人证明，所谓“民主斗士”、“民运英雄”，恰好是无法无天的不法之徒和执迷不悟的反动分子。

对于这一伙名声狼藉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想，还是引用在法国出版的一家报纸刊登的一位台湾读者来信中的话吧，那就是“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原载6月13日《羊城晚报》）

“不介入”只是谎言

·余 泓·

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日前辩称，台湾政府对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没有任何支持，进港补给是对所有外国船只的一种帮助，不会对任何船只有特殊优待。邵氏此番话，用意明显不过：无非是想洗脱台湾官方与广播船的干系。

众所周知，所谓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着向中国大陆从事颠覆性广播；其整个活动是外国一些反华、反共势力勾结被中国政府通缉并已逃到海外的流亡分子合演的一场闹剧；其性质是侵犯中国主权及违犯有关国际法原则和规定的。中国政府一向态度是反对任何国家、地区、组织、个人支持此船对中国进行颠覆性广播。任何方面罔顾中国政府此种态度立场，刻意予该广播船以支持均不是友好的行为。如果是一个国家这样做，它就应承担损害对华正常关系的责任；如果是台湾官方这样做，只会使日趋缓和的海峡两岸关系平添紧张因素，也就证明了它所宣称的和平统一中国目标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区区广播船想颠覆中国政府无异于蚍蜉撼树，绝不足为中国政府所虑。但是，如何对待广播船，却是检测对中国政府态度及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立场的试金石。

台湾官方是明知这番利害关系的。故此，台湾官方发言人一直信誓旦旦地宣称不会介入广播船的活动，将遵守有关

国际电信联合会无线电规则规定云云。还煞有介事地宣布了“两点处理原则”：不准其在公海沿岸广播及依据人道及国际惯例，允其在港口靠岸补给。然而，就算是这两项“原则”，也足以反映出台湾官方对广播船的支持。

所谓“不准其在公海沿岸广播”，只是不在台湾海域内广播而已。广播船目的是向大陆进行颠覆性广播，又何须在台湾海域内广播？在台湾海域外的广播，台湾官方则绝无制止之意，相反予以尽可能的方便。民主女神号真正成为广播船，将是在台湾实现的。据知，广播船将有电视信号、短波及中波等花样繁多的发射台，所有广播设备通过台湾转运上船，并在台湾港口内进行安装、调试，以便甫出公海即可进入工作状态。另据广播船“行动协调技术人员”称，将特设电视接收机收藏在台湾高山上，以配合广播船通信系统，确保广播船的安全。如此庞大复杂的工程，如果没有台湾官方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协助，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令人可笑的是，台湾“交通部长”张建邦称，广播船如补给出海后进行广播，则违反国际海洋公约，将不再接受其返航后的入港申请。明知广播船补给出海后就是为了广播，明知其会违反国际法，又何必让其靠岸补给？如果不是有意支持，又何须待到广播船返航时才不予入境？明知一个凶徒要危害他人，不仅不加劝止，还容留其养精蓄锐，助其装备凶器，即使其犯罪之后不再返回，也逃不了助纣为虐的责任。

所谓依照人道及国际惯例办事，也绝对掩饰不了台湾官方对广播船的支持。广播船到达台湾基隆港之后，台湾军方、警方均出动为其保驾，唯恐有失。台湾军方派出军舰和飞机在附近一带海域巡逻，有卫兵遵“国防部”之命在场戒备，十余名警察在船上保卫，两艘海港警察船泊在广播船边候命。

“国防部长”郝柏村还宣称，广播船离台出公海时，将会派战机及军舰在附近水域巡逻。名曰“巡航”，实为“护航”。出动海空军，出动警方，此当然不可能是“民间力量”所为，也彻底撕下了台湾官方一再宣称的“不介入”伪装。台湾官方这样隆而重之地为广播船护驾，试问，世间又哪有如此“国际惯例”？这不是“特殊优待”又是什么呢？

台湾官方还称，“不能阻止国民对他们(广播船)的一种关切”，似乎颇为尊重民意。但是，官方对质疑、谴责支持广播船做法的意见却充耳不闻。月前曾有立法委员提醒当局，广播船违反海洋法公约，涉及“海盗播送”行为。官员竟辩称有关国际法原则有争议，不足为训。由此也可见，台湾官方支持广播船的立场实际是一贯的。

据路透社报道，台湾一位中年工人就广播船之事说，“为什么法国人要插手我们中国人的事？”“假如在本地这外国干预遇到一些麻烦，任何一个真正爱国的人都应感到高兴。我希望大陆发射鱼雷击沉‘女神号’”。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尚且看得出广播船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实质。台湾官方焉会不知？台湾官方如此厚待广播船，无非是因为彼此之间有着颠覆中国政府和反共的同样立场。如此借助外国势力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任何一个正直的、爱国的中国人只会不齿，而不会予以赞同的。台湾当局还是谨慎从事，三思而行为好。

(原载1990年5月17日香港《文汇报》)

叛逃“精英”亡命录

·何思成·

去年春夏之交那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一些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所谓“政治精英”，如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谔、苏晓康等，惶惶然亡命于国外。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托庇于海外国外的某些政治势力，纠集成所谓“民主中国阵线”，继续游说演讲，造谣惑众，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种种活动。他们在国内披着的救国救民的外衣早已荡然无存，所剩的只是一副十足的洋奴嘴脸。他们刚逃到国外那阵子，曾受到西方某些势力的青睐，喧闹于一时；如今，借用一句商业术语，已是“股市行情不断下跌”，由喧闹渐趋冷落。

如此落魄情境

今年一月三十日美国《国际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民阵”面临三大危机》的文章，开头便说：“民主中国阵线一九八九年在巴黎轰轰烈烈成立以后，很快地从绚烂归于平淡。原来对‘民阵’寄予很高期望的，关怀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提起‘民阵’来，都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情绪：怎么搞的？自从巴黎会议以后，听到的有关‘民阵’的消息，多半是令人泄气的，而很

少鼓舞人心的。”

今年三月十二日《纽约新闻报》一篇文章报道，苏晓康在芝加哥谈及“民阵”“低潮”现状，曰：“第一，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在组织运作的技巧上，欠缺纯熟和一致意见，导致许多内部矛盾，也令多项建议和行动无法定案，被逼拖延。第二，原来民阵主要成员想一边搞民主一边搞学术，结果顾此失彼。第三，处理经费的方式遇到大非议，成为庞大压力。另外，外界对民运人士有‘明星观念’，对他们的道德标准要求太高，也使民阵士气受挫。”文章又据知情人士说，“民阵目前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派别分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谔的体改所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和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容的状态”。他们初期“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期“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有的风头人物“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的健将”，有“贪污街头‘六·四’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有人“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应政治条件者”。另据香港《百姓》杂志报道，刘宾雁在纽约亦称一些“民运”人士“招摇撞骗，争名夺利，拚命造谣攻击别人”，而且有人“将捐款占为己有”。

台湾《联合报》今年三月十三日报道，以“我要成名”为由入哈佛大学做非正式“访问学生”的吾尔开希，近日承认不是读书的料，悄然离校，临去前未通知校方，也未向为他帮忙的教授打个招呼。

台湾《中国时报》去年十二月八日报道，“‘民阵’自九月成立以来曾在美国和法国筹到四十余万美金的经费，但是由于各种有关民阵负责人花费无度，浪费铺张的消息传开之后，

‘民阵’收到的捐款已显著下降。十一月期间，‘民阵’总共只收到一百美元的资助(五十美元和五百法郎)。”

“一团荒火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看来，外逃“精英”确实“陷入低谷”，走向落魄，渐入颓唐了。这也难怪，到“自由世界”去闹中国的“民主”，把从西方贩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再返销给西方，自然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买账。至于他们要求制裁自己祖国之类的言行，更让正直的人们反感。这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的。

如此“爱国”面目

“精英”们在国内，大抵还半遮半掩，借诸如反腐败、反“官倒”一类的口号来制造动乱的舆论和气氛。人们还记得，去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新学联一号令”规定的口号中，便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内容，当时一些善良的群众和阅历尚浅的青年学生，还难以看穿其包裹着的政治用心和真实面目。但是，他们一跑到海外，便有恃无恐，立刻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原“高自联”的一个头头在美国柏克来大学讲演时十分露骨地说，他们是“以悼念胡耀邦为借口”来策动动乱的，当时“没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口号”，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能接受过激的变化”(《国际日报》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据台湾《中国时报》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报道，万润南在东京与台湾新闻机构进行座谈时，除表示对台湾当局的“推崇”之情外，还以身自荐说：“亡共在‘共’，……从‘共’中出来的‘共’，才是亡共的主力，而民阵就是这个‘共’”。不但发誓要“亡共”，而且要当“亡共的主力”，牛皮吹得不小，读来令人可

恶，但他们反共的政治立场以及要同什么人携手合作，已是和盘托出，人们足可了然。

陈一谔去年九月九日在台湾《联合报》上称：“中共政权我认为无法持久的。”在九月十一日的《明报》上又宣称：“我相信中国人民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改变”，“在中国大陆达成结束专制、重建人权、产权普及及重建共和的目标。”

“精英”们在国内四处活动之时，一直摇着“爱国”的旗帜，可是一踏上异国土地，却将其弃之于地。除了“以‘共’亡共”之计外，他们又抛出了“以夷制华”之计。他们四处游说，做伪证，不遗余力地鼓动“制裁”中国，想让外国人替他们出口“恶气”。严家其献出一个“比例制裁原则”，以备主张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西方势力参考；陈一谔在巴黎一露面，便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停止对中共实施的制裁，否则，“对美国而言，则是一项极坏的投资”。

去年我国国庆，外逃“精英”想搞个大动作，丢丢中国的丑。他们的这种行为，为海外广大的爱国者所不耻，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抵制。一位在美国的访问学者说：“国庆是人民的国庆，也是自己的国庆，怎么能去使馆游行反对自己的国庆？！”不少美国的教授认为，中国学生应好好学习，为国效力。他们对弄风弄雨的“民运”分子很不感兴趣。

为了网罗所谓“联合战线”和取媚于西方某些人，外逃“精英”不惜以损害祖国的统一和完整为筹码，向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的人大送秋波，又是“致电祝贺”，又是要“一起争取人权”，又是做“荣归故里”的预言，等等。

除上述言行外，“精英”们还说了很多咒骂式的话语。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十年是“阴阳倒错的四十年”，是“历史的

误会”，
糊涂蛋
来，宣
八九年
亡”。他
以“衣
然
连一些
高层人
都治理

众，他
潮。
海外
《南
的文
事实
引用
前后
种改
人，

篇文
“打

误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一则指责历史是个昏聩的糊涂蛋，二则恨自己投错了胎。他们恶狠狠地诅咒祖国的未来，宣称“中国将出现经济的全面崩溃”，“中国的经济（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将崩溃”，中国“将发生大动乱，导致政权败亡”。他们很希望中国出现这种灾难性的前景，以为这样就可以“衣锦还乡”了。

然而，这类预言，有多少人会相信它不是政治梦呓呢？连一些有阅历的国民党人士都看出他们不成气候。一位台湾高层人士指出：“大陆非有共产党领导不可！其它任何政党都治理不了大陆！”应该说这是他积数十年的经验之言。

如此“民主运作”

去年六、七月间，是外逃“精英”最风光的时期。为了惑众，他们云天雾地地制造流言，确实煽起了一个不小的谣诼风潮。然而，造谣有术也有限，随着事态真相的逐步澄清，一些海外舆论也对他们这一群“民主斗士”的可信性“打了问号”。《南华早报》去年九月一日刊载一篇名为《吾尔开希的荒唐话》的文章，在引用吾尔开希一些耸人听闻的所谓“亲眼看到”的事实证词后，指出他不具有在场“亲眼看到”的条件。文章还引用了中立派观察家看到的事实真相，列举了吾尔开希若干前后矛盾、信口捏造的胡话，指出：“这位学生领袖显示出一种改写历史的才能，而激烈地谴责政府歪曲历史的不是别人，正是吾尔开希。”

今年二月三日，吾尔开希在外逃后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看‘打倒共产党’”。他故作高深地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

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正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即：它虽有存在和执政的权力，但应当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使它不能执政。”他主张“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打倒后再“不允许注册成立”，而“应当坚决取缔”。这段话虽然近乎痴人说梦，却是道出了“精英”们所谓“多党制”、“多元民主”的底蕴。他们全部的政治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并永远被“取缔”，而由他们上台独裁一切。这就是他们“民主”、“自由”的实质。

他们自认为是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对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瞭解只处于生吞活剥、搬弄词句的水准上。用美国《新闻周刊》文章的话说，他们“不曾见过实际的民主运作方式”，“有时对民主的承诺走火入魔，最近在波士顿附近的一家餐馆聚餐时，他们竟以举手表决方式才能决定点什么菜。”在所谓“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上，各色人等争权夺利，各不相让。严家其出面呼吁莫因私利角逐主席。一个出席会议的外国代表团也承认“确有混乱”，于是口传心授，“建议‘民阵’应提倡专业管理和公共关系，但这些提议在理论的争持和谁该被选为领袖的窝里斗问题下，显得苍白无力。”（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香港《明报》）

外逃“精英”有一种妄自尊大的习性，用外界的评论说，就是“自视过高”，“总是一个人说了算”，“除了唱高调，喊口号和漫骂外，肚子里真没有什么货。”他们的言行中常流露出一种极恶劣的“霸气”，同他们高谈“民主”形成鲜明的反差。去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发表文章，从国际战略格局和美国长远利益考虑，劝导美国政府勿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他还根据自己对世界当代政治历史的瞭解评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在其首都的主要广

场，被
外逃“
“狗屁”
台。
外
急。在
拟出投
的措词
了。

外
现实
操作。
有专
露面
他们
飞机
海外
乡联
希此
党方
不久
露，且

场，被几万名游行示威者占领达八星期之久。”这些话触疼了外逃“精英”，吾尔开希大骂基辛格博士“无耻”、“胡说八道”、“狗屁不通”，并扬言要去辩论，但最终也未见他的“辩论”出台。

外逃“精英”的“民主运作”水平，很让背后的种种势力着急。在美出版的台湾喉舌《世界日报》就此训导说，“需要仔细拟出投合西方价值观念，具体、诚实的说词”，“不能靠尖锐的措词和口号”，言谈中已露出几分“竖子不足与谋”的感慨了。

如此“独立”品格

外逃“精英”喜吹标榜“政治独立性”。然而，政治斗争的现实逻辑却无情地揭下了他们的这种面纱。

早在他们外逃之时，即有外电指出是外国情报机构从中操作。其后，英国《星期日快报》又说，吾尔开希等人在国外有专门“保镖”，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抵美之初，他们先不露面作神秘状，实为从事幕后训导策划活动；准备停当后，他们便破门而出，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专访。

去年七月二十五日，吾尔开希自巴黎抵达芝加哥，一下飞机便乘车直奔一个所谓的“医生”家，去会见台湾国民党的海外工作会主任，并合影留念。那个“医生”是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正在打算竞选台湾海外“立法委员”。吾尔开希此举曝光后，引起广大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感。台湾国民党方面赶紧让他出面“澄清”，诡称“事前不知情”云云。然而，不久台湾方面又露了底。据在纽约出版的台湾《时报周刊》透露，国民党的海外工作会主任当时赶赴美国，目的就是做大

陆留学生的的工作。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台湾方面已为此捐助了六百万元。

去年底，外逃“精英”纷纷去台湾“学习取经”。在此前后，他们对台湾当局“颂声大作”。陈一谘称“三民主义是有道理的制度”，苏绍智称台湾“民主化过程在大陆可行”（纽约《世界日报》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报道），万润南则说“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基地只能在台湾”（去年八月十五日洛杉矶《国际日报》）。有人甚至用起风水先生的“鬼画符”之术邀宠，说什么大陆形状如鸡，台湾形状如卵，卵必长成为鸡云云。

台湾《中国时报》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报道，万润南等在日本会晤台湾新闻机构负责人时，万陈情说：“如果台湾不瞭解‘民阵’等最新的民主力量，如果仍有独善其身的不去趟混水的自我想法，可能会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何以这般婉转哀求？该报同一天的另一则报道露了个底：“需要能获得财务方面的支持”。又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文章称，“只是头三个月‘民阵’就用掉了五十六万美元”，“打开窗子说亮话，可能在台湾得到帮助”，“这本身的格就有问题”。

台湾《联合报》今年三月六日报道，万润南等人对记者发表访台观感时，有的“坚信台湾民主政治将来有一天会统一大陆”，有的对高喊“台湾共和国万岁”的募款餐会“印象深刻”。

刘宾雁也抱着“小学生”学习的态度去了台湾。据报道，他在台湾领取了《中央日报》补发的“稿酬”。在台期间，他还几次求见台湾作家李敖，但李拒而不见。李敖说，刘宾雁让国民党要了。

挟洋人以自重，仰台湾以施舍，结果如何呢？正如《欧洲时报》所说，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不论是从大陆、从台湾、从东南亚来的，对他们已不再有什么兴趣。“现在看来，也只

有台

有句
不屑
并不
来他

都为
击漫
覆去
无味的，

有台湾的国民党愿意豢养这一群了。”

动乱“精英”们到海外国外寻找“庇护”将近一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去国无怨词”，“精英”们对此或可斥为旧道德而不屑之，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替人捧场，为人叫骂，做人并不自在，也不自由，嗟来之食，吃下去是要肚子疼的。看来他们也逃脱不掉这种惩罚。

古今中外，无所持守，背弃祖国，丧失气节的人，从来都为人类所不齿。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有人也许还要继续攻击谩骂下去，骂祖宗，骂祖国，骂共产党，骂中国人，但翻来覆去也就是那么几句，“把破帽年年拈出”，自己也会觉得索然无味的。此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早已指出的，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幡然悔悟，赶快认罪。

(原载1990年5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严家其说梦

· 书 稿 ·

台湾《中国时报》九十年代第一年的元旦，登了严家其的《展望九十年代的中国》。

大约因为往事不堪回首，智囊团沙龙里的宏论，天安门广场的起哄，一概灰飞烟灭，得到的只是“动乱精英”的雅号，和惶惶若丧家之犬的出奔，于是展望。身为什么阵线的主席，日日陷身混乱、不和、争权夺钱，布不成阵，排不出线，却仍要打气，于是还靠展望。

略略数去，他展望出了六十个“将”。

“在非毛化和非邓化的高潮中，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将最终从天安门城墙上移走。”

“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马克思主义，连同列宁主义将遭到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将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抬头。”

“修宪或制宪的第一步，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删除现行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原则’。”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大陆将最终失去它的影响力，在九十年代或下一世纪初，共产党必将丧失它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如此等等。

精英如严家其，亦竟如此词语贫乏，江郎才尽，只剩下颠三倒四、罗嗦重复的才干，“将”出这么一篇劳什子，实在也足见那阵线的无人。然而仇恨中国、仇恨中华民族者的算

于
工
和
和
日
编
往
是
1988
看到
线的
统一
们倒
外”。
康得出
《香港
8日的

盘和底细，该是洞若观火了。

严家其另有一文，题目便是《我仍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登在1月14日的《亚洲周刊》上。其中，他“作为民阵领导人”宣告的韬略，一是“东欧的变化给我们很大鼓舞”，“东欧方面，我们正在联络中，已有民阵理事到过波兰考察”，并且“准备召开一次关于共产国家‘和平演变’的国际讨论会”；二是“‘民阵领袖’访问台湾是很有必要的。”

这韬略自然极美妙，可惜这“将”的变成现实，实在不亚于自地球迈了腿登太阳。

理事的访问，照例满口民主。然而主人未必赏脸，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从美国留洋回国，说的是波兰需要“独裁和强权”，“要求人们干活并强迫人们干活的强权”，“多元化和自由不符合今天波兰的时局”（波兰《青年旗帜报》2月19日）。几次“国际讨论会”，便能让中国“和平演变”么？这自己编的神话，恐怕严家其也不相信的。

讲到台湾，就神气得多。还在动乱发生前一年，严家其往香港参加一个研讨会，便颇显出马屁本领的不凡，称台湾是“健康的力量源泉，对大陆可起很大的影响”（《中国时报》1988年6月6日）。动乱暴乱里的戏，那影响如何，读者已经看到。去年12月31日台湾《联合报》上，曾专登了严家其那阵线的要人万润南、苏晓康等访台，向“幕后英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马树礼“热情致意”的消息。万润南们倒不打自招，说“若知中共这样对待民运，早应‘勾结’海外”。今年1月12日，他们又参加台湾的一个座谈会，由苏晓康得出“台湾的存在，显然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系”的结论（《香港时报》1月3日）。这句结论的底蕴，香港《明报》1月8日的一篇文章，是说得清楚的：“支持与利用民运人士，

台湾态度由暗转明”，“支持是手段，利用是目的”，“当大陆民运人士在海外安顿下来并重新集结时，台湾当局则立即以自己的金钱优势试图加以控制”。

如此这般之后“将”怎样，不妨照旧请“民运人士”来回答。美国《纽约新闻报》3月12日，刊登《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算是讲了几句老实话。苏晓康承认，他们那个阵线“正处于低潮”，“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意识”，因此“士气受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文章还引了“观察家们”的话：

民阵倘堕为半个世纪前白俄的流亡心态，则将一事无成。目前有个别参与民运的风头人物（不单是在民运内部！也包括其他个别组织）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这就是为何民运组织总是内斗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极少数极少数”贪污街头六四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更不值一提了。还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完全丧失了民运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独立性，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允政治条件者，则更是完全自我异化，成为大陆民运的耻辱。

严家其的展望和韬略，其实不过说梦，自己壮胆而已。那原因，是在他“将”来“将”去，却一概无视中国十一亿人民的愿望，只是“将”出了自己的狂妄和怯懦。靠说梦自慰，也算权利，他人如何剥夺。然而在严家其的时间表上，他“将”怎样呢？是变成或已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还是准备拿或已拿“某方面津贴”呢？

九十年代已经过去三个月，不妨再看下去。

（原载1990年4月4日《光明日报》）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

——评严家其《展望九十年代中国》

·徐功敏·

正当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跨入90年代，同心同德地为实现20世纪最后10年的伟大任务——由温饱走向小康的时候，策划动乱失败后叛逃国外、身为反动组织“民阵”头目的严家其又抛出了他的“新作”《展望90年代中国》（连载于香港《明报》1990年1月1、2、3、4、5日）。这篇“新作”除了重复过去的谎言、诽谤和自我吹嘘以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剖析这一纲领，将有助于我们认清严家其和他拼凑的“民阵”究竟想干什么。

（一）叛徒面目的大暴露

在《展望90年代中国》中，严家其写道：“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世界性运动——共产主义运动，连同自己的意识形态，绝不可能把人类引向美好、公正的社会。相反，它以美好的未来为幌子，在人类史上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为名的空前暴虐的专制统治——社会专制主义的统治。”“共产主义的衰亡只是继封建专制主义之后，消灭了一个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言辞掩饰起来的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社会专制主义。”在这篇近万字的文章里，严家其这样咬牙切齿一再咒

骂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以反对封建专制为名，行反对社会主义之实的必然结果。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自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日起，对它的迫害和造谣中伤就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警察的敌视，还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关于摧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梦呓，都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上年纪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攻击，至于国际反共反华势力的“共产暴政”、“极权政府”之类的谰言更是长期不绝于耳。

可是中国人偏偏不信邪，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以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了一个独立、统一、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经历多少艰难和挫折，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的信念却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同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来之不易，而又行之有效。要我们弃之如敝屣，而去听信严家其之流拾十七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牙慧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一类陈词滥调，岂不是白日做梦吗？敌对势力如此使劲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二）撼山易，撼中国共产党难

在《展望90年代中国》一文中，严家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诽谤和攻击。请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四

十年统治的后果，就是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政是当代中国各种灾难的总根源。”“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非毛化和非邓化对中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成为一种灾难的代名词。”用词之恶毒，恐怕一些反共老手也要自叹弗如了。

可惜，拥有48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且经历了1989年的严峻考验后，正锻炼得更坚强，和人民群众联系更紧密。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引导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中共执政40年，中国洗刷了百年耻辱，赢得了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中共执政40年，11亿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有了保障，旧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已经改观。与历史上其他政党相比较，中国共产党的功业是彪炳千秋的。

为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家其提出两个办法：一曰“反对党的建立”；二曰“非共政府和多党联合政府的组成”。严家其不无醉意地说：“当非共政府在中国大陆诞生时，‘五星红旗’上代表‘共产党’的那颗‘红星’就无法再占据中心地位。到这一天，这样一面‘红旗’不仅不能象征中国，而且不能象征大陆。”哪儿来“反对党”呢？严家其提出三个方式：第一是1989年动乱中出现的“高自联”、“工自联”、“北知联”等非法组织“逐步发展为独立于共产党的政党”；第二是“中国大陆现有的非共政党”，“逐步发展为反对党”；第三是严家其之流在海外拼凑的“民阵”、“民联”等反动组织或“政党”进入中国大陆。真是如意算盘。严家其在叛逃前就不遗余力地挑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胡说什么“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1986年7月7日在民盟中央纪念“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提出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如磐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进一步落实，最近，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已形成规范性文件，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严家其在这里又一次枉费心机了。至于他自己和一些臭味相投的叛国分子拼凑的小组织，虽然能一时讨得反共势力的赏钱，上演一些反共反华的丑剧，但也势孤力单，矛盾重重，观众已经越来越少了。1989年他们还曾吹嘘两年之内重返大陆，1990年初连这个自我壮胆的大话也不敢说了，可见其心虚。“反对党”既然难产，那么“非共政府和多党联合政府”岂不是泡影？

严家其梦想“在90年代后半期或21世纪初，中国将成为一个政党林立的国家。大大小小的政党，各种政治色彩、政治倾向的政党将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中国大陆将形成稳定的两党或多党体系，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才可能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这也是梦话。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人们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一时政党团体达三百个。但实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导致“洪宪复辟”，中国陷于北洋军阀专权和军阀混战的局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外，先后又成立了一些政党团体，但由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这些中间党派在解放战争中又都分化，多数拥护中国共产党，少数追随国民党，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营垒，最后以中国人民武装斗争胜利而形成海峡两岸对峙的格局。可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捍卫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强决心，那种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资产

阶是冲提派后先

财产“没的。可能为业。一。要实

经济其资

直接权、定：的公

阶级两党制和多党制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敌人是异常野蛮残暴的，代表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双方，其较量和冲突的场所很难为议会所包容，而反动派总是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其实，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如果党派林立，议会权力过大，往往也难持久稳定。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和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第四共和国的先后瓦解，就是其实例。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

在《展望90年代中国》一文中，严家其露骨地说：“私人财产权的保障……是任何一部民主宪法不可缺少的原则。”“没有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混乱，……是由于企图把两项不可能结合的事物，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保障私人财产权，大力发展私人企业。”“分阶段私有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措施的三大支柱”之一。“集体化……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一切权利，……有必要实行‘土地私有化’。”

严家其明白，直截了当地提出建立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得人心的，但我们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其资本主义实质。

第一，财产权问题。财产权是相对于人身权而言的，是直接跟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权利。按其性质可分为公共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财产权三种。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

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并强调“正确认识和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是深化和完善改革的关键问题。”而严家其贬损计划经济，鼓吹市场经济，正是他企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个手法。

严家其卖力地兜售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纲领，连海外国外也应者寥寥。1989年8月14日《台湾时报》刊登了《变迁时代知识分子不应忘本——汤慎之教授评严家其》一文，汤教授说：“严家其相信唯有私有制，才能实施市场经济，才能消除官倒、分配不公，均是胡说。”“大陆的科学、技术比台湾进步得多了，都将人造卫星发射进入太空，证明不是假的。所以，大陆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切学西方。”香港《明报》1990年1月9日刊载鲁凡之《评“民阵”与严家其主张》一文，认为严家其“排斥公有制及国营经济的私产资本主义路线……是过了时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高估”。

当前，一些国家公众一度曾被西方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介煽起的偏激情绪已经降温，有关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谣传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严家其之流在海外国外主子的眼里也随之而贬值。面对外部孤立、内部分裂，严家其之流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改革派”、“激进派”之类的遮羞布统统丢掉，明目张胆地抛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以此博取主子欢心，并使同伙重振旗鼓。只是颓势已定，尽管气势汹汹，却挽救不了江河日下的命运。不过，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严家其赤膊上阵，再一次提醒我们，敌人是不会自动

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斗争是客观现实。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必须持久开展下去。

(原载1990年5月18日《光明日报》)

（此处为原文主体内容，因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转录，仅保留可见的段落结构）

国社有主以助十什
毛
是头思言展，错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 面目的大暴露

——评苏绍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论

· 马理铭 ·

去年6月北京地区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海外极少数中国人追随某些国际反动势力，掀起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鼓噪。其实他们就那么几个人，杂七杂八，没有也绝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但是既然他们提出了种种纲领、主张和观点，把他们原来不便讲明的话讲了出来，这倒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可以帮助我们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交锋和分野十分明朗的背景下来思考我们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同什么划清界限，向什么方向前进。

在这片鼓噪声中，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

苏绍智出逃后，在海外的政治表演已有半年多了。他又是写文章，又是发表谈话，造谣诽谤，胡吹瞎说，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苏绍智在海外的言论，是他长期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继续和恶性发展，充分显现了他的反动政治面目，也使他过去宣传的许多错误观点的实质和归宿彻底暴露出来。

这里没有必要把苏绍智的种种攻击和诽谤一一拿来加以答复，而仅就他根本否定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言论略加剖析。

苏绍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认为我们这几十年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加斯大林主义”，“徒有社会主义之名而无社会主义之实”。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并鼓吹所谓“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妄图用这一套来改变和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思考的也就是这个根本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新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成果，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按照这条路线，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克服原来体制和观念中僵化的东西，正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优越性，为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于改革的由来和根据，对于以往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对于推进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也会有种种不尽相同的判断和估计，主张和方案。这里当然也有是非问题，或者全面不全面、高明不高明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而另外一种分歧和争论，

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某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在一些时候和一些场合也自称“社会主义改革者”，甚至“最激进”的“改革者”，但是事物的发展进程，终究会使他们无可逃遁地现出原形。他们实际上是在“改革者”的名义下，主张抛弃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苏绍智就是这样。

苏绍智认为我们这几十年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徒有社会主义之名而无社会主义之实”，他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当我们党认真揭露和分析建国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挫折，揭露和分析我们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时，一股错误思想潮流由隐到显地发展起来。那就是极端夸大这些失误和问题，歪曲地分析它们的根源，借以根本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取得的基本成果，甚至根本否认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正是针对这股思想潮流，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尖锐批评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混乱，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尔后党的十三大在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时，又强调指出了这个论断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们党的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

的，因为它立足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居于指导地位。这就实实在在地表明，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正是依靠这个基本制度，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有过什么失误和挫折，也无论还存在什么弊端和不足，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我们搞改革，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为着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基本成果。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维护还是抹杀社会主义基本成果，正是区分人们是搞社会主义改革，还是在“改革”名义下否定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的界限。10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次斗争，反复说明了这一点。

苏绍智诬蔑我们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骂倒。这完全是徒劳的。在中国，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最鲜明，斗争最坚决？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反封建，但是他们太软弱，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个历史任务担当起来，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中国大陆几亿人口中进行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最终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铲除了封建专制主义赖以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都是不能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当然，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之后，还必须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继续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仍然是

一
设
重
点
的
布
残
封
度，
民
利
方
面
对
和
天
认
为
看
得
义
改
出
和
是
适
“反
端
夸
导、
说
成
资
本
义”，
用
心

一个严重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也能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加以解决。这方面曾经注意不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郑重宣布：“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同一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严肃地提出和切实地来解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这条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苏绍智之流，则是借“反封建主义”为题，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他们一是极端夸大封建主义的影响；二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来加以攻击和反对；三是鼓吹只能靠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所谓“封建主义”。这样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只能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

至于苏绍智攻击我们搞的是“斯大林主义”，那也是别有用心和目标的。斯大林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经

验,研究社会主义改革,无疑是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分析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冷静地面对历史实际。斯大林时期苏联党和人民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必须肯定;而对于斯大林时期那些败坏社会主义声誉、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则必须否定,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关于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也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同时要看到,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反对了那种把苏联经验和斯大林意见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理所当然地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但也绝不能说我们是全盘照抄斯大林。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更是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斯大林教训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但苏绍智把他所说的“斯大林主义”说成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类似的东西,又把我国40年社会主义称之为“封建专制主义加斯大林主义”,并把这说成是什么“压在今日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他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编造危言耸听的东西,用这种手段来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丝毫无损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只不过使他的仇视社会主义的面目更加暴露而已。

特别是看一看苏绍智拿出什么东西来代替他所谓的“封建专制主义加斯大林主义”,问题就更加清楚。他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就是这么几条:一是在政治上,主张“废除一党专政”。他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叫做“一党专政”。二是在经济上,鼓吹“说得更彻底一点,就是要私有化”。既然要“私有化”,那就不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发展一部分私营企业作为

补充，而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三是在思想上，反对所谓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官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称之为“官学”。他的这一套，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化。

这里我们要对苏绍智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多说几句。苏绍智竭力诋毁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说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被当成了一种“官学”，“引起思想僵化”。中国要不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种指导地位是不是必然导致僵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苏绍智有着根本分歧。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形成的，它对于保证我们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取得这个指导地位，是靠真理的力量；坚持这个指导地位，仍然是靠真理的力量。当然，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些同志容易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不是通过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分析的方法去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我们党在5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这种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更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1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地发展，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因此，决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只要居于指导地位就注定会僵化，更不能借口反对僵化而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表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如果削弱以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以至放弃了党

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削弱以至放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那也会出现极大的危险。其结果，势必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泛滥，使我们整个社会陷入极大混乱之中。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四化建设，什么安定团结、国家统一？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苏绍智之所以这样起劲地反对什么“官学”，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的根本意图就在这里。

二

还必须指出，在苏绍智那里，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其矛头所向，是要直接地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集中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他的思想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他政治本质的进一步暴露。

苏绍智对列宁主义的攻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和党的学说，二是否定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

苏绍智把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归结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甚至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专政只有一肩之差”。在这里，苏绍智完全不是什么批评缺点、指出弊端，而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和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社会的思想理论武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人民民主专政，对广大人民是民主的，对反对并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则要

实行
主义的
制度
资本
专政
的语
落到
列宁
党原
么？
则，
的力
众的
上保
组织
任，
思主
宝。这
为重
也就
活中
的一个
究和
楚明白
难”，其
反，是

实行专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是福音，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无疑是灾难。苏绍智不是崇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吗？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没有专政，它的专政是建立在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至于法西斯专政，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的赤裸裸的形式。苏绍智竟用“法西斯专政”这样的语言咒骂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只能表明他在政治上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苏绍智还特别攻击列宁的建党学说，说什么“问题出在列宁的建党原则”，他认为这一原则过时了，“仍然按列宁建党原则行事，这就会造成大的灾难。”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原则，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这样来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凝聚起来、组织起来，进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正是依靠这个武器，从组织上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巩固，能够成为强有力的先锋队组织，担当起率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斗争的领导责任，而不致成为一盘散沙。这个原则，是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须臾离开的重要法宝。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四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来说，尤为重要。取消了它，就等于毁掉党的战斗力，毁掉党的组织，也就是毁掉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如何完善，如何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来不断地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长期任务。但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种种曲折乃至“灾难”，其原因，绝不是由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而恰恰相反，是由于民主集中制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遭到破坏的结果。

苏绍智还说：“列宁过去反对修正主义（指伯恩斯坦主义——引注），修正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是在沙俄专制的条件下修改了马克思主义，两者都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完全抹杀了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的重大意义，是对列宁主义历史地位的公然否定。大家知道，本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中列宁同伯恩斯坦主义斗争的实质，绝不是仅仅限于如何评价这个或那个国家发展进程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看待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发展，如何对待正在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人类历史上具有崭新内容的伟大革命。就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夕，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资本主义矛盾的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战争来了，他们又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要“保卫”各自的帝国主义“祖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农民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又竭力攻击十月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的要害所在。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点以及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通观20世纪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回过头来看，列宁在本世纪初的关键时刻，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矛盾全局的基本分析是科学的，他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他把社会主义从一种学说和运动变成创立新国家、建设新社会的巨大规模的实践，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是由于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才有十月革命，也才有后来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20世纪空前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列宁

主义的伟大胜利，没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破产，人类可能至今还在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统江山的奴役和压迫之下。总之，无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和经历着什么样的磨难和曲折，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成果及其对当代历史发展的意义都是不容否定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苏绍智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他还说：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只是作了一些大的方法论的估计和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空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灵魂的阉割。必须明确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仅仅归结为“一种文化”而已。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他们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由此作出的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都是科学的真理。他们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预见，绝非“只是”“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空想”。第三，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整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当然，这种发展只能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而绝不能借口世界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列宁当年在揭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灵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

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苏绍智今天采取的，不也正是这样的手段吗？

三

苏绍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上长期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前后，苏绍智就打着反“左”旗号，发表文章，提出中国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怀疑并实际否认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苏绍智的错误观点，党组织和理论界的同志们进行过批评和帮助，希望他能改正。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苏绍智曾对自己的错误观点作过一点检查。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言行不一，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他摆出一副“改革者”的面孔，打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社会“缺乏真正的民主”，“没有自由”，要靠搞资本主义来“补课”，等等。他的这类言论，受到海外一些人的喝采，说他是“持不同政见”的“理论家”，苏绍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从局部的思想理论观点错误，发展为系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马列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

争，并
1989年
骨地批
样，苏
展为
叫嚷
煽动
开信
日，
再沉
行。
明》，
以此
出逃
势力

的斗
阶级
社会
亡，
面
人
患
义
展，
导

争，并把他的发言稿送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常活跃地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立场的错误，而且发展为直接在政治行动上煽动动乱。动乱开始后，苏绍智公然叫嚷从动乱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更加积极地参与煽动策划。4月27日，他和严家其等人发出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反对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决定。5月13日，他和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报，煽动知识分子参加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6日，他又和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出《五·一六声明》，扬言如不接受他们的政治要求，就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此来要挟党和政府。北京地区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苏绍智出逃国外，积极参加了海外的反华反共活动，成为国际反动势力的应声虫。

* * * * *

从苏绍智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社会主义的敌人兴高采烈。他们叫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灭亡，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灭亡。但他们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面对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反共主义的鼓噪，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远阔的历史眼光来观察眼前事变，我们的忧患意识是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之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40年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10年的历史发展，使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改革开放是不会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正确路线和1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立足于这个基础，我们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埋头苦干，迎接90年代和21世纪。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和巩固，往往是要以上百年以至几百年来计算的。在这样的过程中，磨难和挫折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建立的历史是这样，社会主义更会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社会变革，较之以往的社会变革深刻得多，复杂得多。我们的事业，不可能是笔直简单地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而只能是既有来潮，又有退潮，既有胜利，又有挫折以至一时的局部的失败。但在长期反复中，来潮和胜利终究是主导的东西，最后胜利必将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

（原载4月25日《人民日报》）

是一个
生期
已，结
暴乱后
产阶
主义社
在香
己，但
“就怕
谁还
何面
“知”

革命暴
反动结

且看陈一谔的真面目

龚佐周 金 灿

陈一谔，这个所谓的“智囊人物”和自诩的“精英”，其实是一个触犯刑律的不法之徒。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发生期间，他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初则欣喜不已，继则推波助澜，最后剑拔弩张。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后，他仓皇出逃，完完全全撕去了一切伪装，在西方资产阶级面前摇尾乞怜，求助于国外敌对势力，从事贩卖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

陈一谔以其戴罪之身正在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时候，却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引用古人的一句话自吹说：“不怕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实际上，把这句话反过来对他最为贴切：“就怕别人知己，不怕己不知人。”如果别人知道了他的为人，谁还听他的胡言乱语？如果他知道了别人对他的看法，他有何面目见人？现在，我们把他的言行公布于众，让大家都“知”一“知”。

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

陈一谔畏罪潜逃国外后，很快就与策划、组织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精英人物”严家其、万润南等人纠集在一起，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据国外报刊称，这帮人逃出之后开

始还不知所措，陈一谔一到就成了“群龙之首”。他被推为“民阵”的“筹委会主席”。“民阵”成立之时，他是这场闹剧的开幕式主持人。然而，诡计多端的陈一谔却不参加“民阵”主席的竞选，只当了个“理事”，且倡导组织了一个“科学民主基金会”，作为“民阵”的智囊班子，这也为自己铺设了可进可退之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陈一谔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国外发表的言论中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他胡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1989年10月15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10年改革与89民运》为题，作逃出大陆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说什么“让共产党这样的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在海外谈话中反复提到要“政治多元化”。什么是“多元化”呢？在1989年12月1日的《百姓》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谔作了毫不掩饰的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与虎谋皮”。1989年11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演讲中，陈一谔联系5月中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讲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五个月前，就是这个陈一谔，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10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呢。原来，陈一谔的“待人以诚，处世以信”的口头禅只不过是他的——张假面具。

陈一谔出逃后，在海外到处以“改革者”标榜，那么陈一谔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他多次鼓吹的“第三条道路”。

香港
陈一
走，
1989
一个
济改
革的
资料
色，
单，
能少
大多
也明
更引
政
根
败
败
软
政
治
“
么
达

香港《百姓》杂志登载的那篇采访录中透露，早在1984年以前，陈一谔就认为：“不走第三条道路中国就完了，这条路不但要走，还走定了。”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政治方面，万润南在1989年9月22日“民阵”成立大会的讲演中作了注解：“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经济方面，陈一谔的解释是“经济改革触及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有制问题”，“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能不能由民置产”。说穿了，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陈一谔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落后，有11亿人口，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少数人聚敛巨额财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允许走这条路。陈一谔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曾绝望地说：“指望这样一个政权改弦更张，非常困难。”怎么办呢？按他的逻辑自然是颠覆人民的政权，让共产党下台。本文前面所介绍的他的种种叫嚣，其根源盖出于此。

现在，陈一谔在海外可怜巴巴地自称是“一位改革的失败者”（即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者）。但是，他不甘心失败。他有种种幻想：“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他声称：“海外的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什么是海外抗议势力？陈一谔明确指出：“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更为可耻的是，陈一谔还直接求助于国外敌对势力，说

什么“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现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这是绝对必要的”。1989年9月7日他在巴黎发表谈话，还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和实行经济制裁”。他甚至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一伙的支持和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

陈一谔的上述图谋和行为，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穿了他的真面目。陈一谔表演得越充分，他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丑恶面目就暴露得越彻底。《欧洲时报》刊载的一位台湾读者的来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谔者流，自诩理论家，但他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暴乱之前作舆论动员

陈一谔的真面目，其实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就已经得到充分的暴露。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病逝，极少数人立即借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此时住在医院的陈一谔甚为欣喜，对从北京波及到其他一些地方的动乱大加赞赏，说什么动乱表明“民心不死、民气可用”。陈一谔要把“民气”“用”来做什么呢？就是企图通过学潮搞乱社会，达到在安定条件下他们所达不到的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于是，他四出活动，到处游说，编造谎言，攻击中共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其实，当时有些情况比北京市委负责同志汇报的还要严重，这一点对自称“离决策太近”的陈一谔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5月18日，陈一谔得到某人提供给他“内部消息”。5

月19日上午，他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人，以及体改所正处级以上干部开会，安排当时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局长高山到会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透露了赵紫阳同志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消息。随后，陈一谔在会上煽动说：“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必须旗帜鲜明。现在有必要发表一个声明。”他口授了《关于时局六点声明》的内容，并决定用“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这份声明把动乱说成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居心叵测地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同时暗示人们政府要“采取极端措施(如军管)”。这实际为后来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拦戒严部队军车进城，以致发展到一些暴徒发动反革命暴乱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

当天下午，陈一谔又召集体改所全体人员大会，以组织的名义裹胁体改所干部参与其支持和煽动动乱的活动。5月20日清晨，经陈一谔同意，体改所的张钢等人以“三所一会”的名义，炮制了一份声明，即《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公开诬蔑党中央的决策，指名攻击李鹏同志。

5月20日上午，陈一谔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面见当时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与其密谋策划。鲍彤对陈一谔搞《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表示赞赏，同时又指示陈一谔不能过分暴露，对陈一谔进一步面授机宜。

陈一谔从鲍彤处回到体改所后，想到再用“三所一会”名义发表声明过于暴露，于是指使人销毁印好的《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传单，并通知已经收到这份声明的新闻单位不要发表。同时，决定采取新的手法继续其反革命阴谋活动。陈一谔很快召集了体改所，农研中心发展所的一些人开会，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先是得意地宣称《六点声明》已经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接着便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央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制止动乱的决策是“一系列阴谋活动的结果”。在进行了一番煽动之后，陈一谔便部署搞几份传单，但指明不能署“三所一会”的名字，也不能由“三所一会”的人直接去张贴散发。他用一种阴谋家的口吻说：“现在形势严峻，我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能再书生气。”在这个会上，他具体地确定了匿名传单的标题、内容要点、执笔人和打印散发的各项事宜。他一手策划炮制的《李鹏其人》、《紧急告全国同胞书》、《敦请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案》、《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提出弹劾李鹏案》四份反动传单，落款分别是“举报中心知情人”、“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及直属部门部分党员、干部、职工”、“共和国公民”、“首都知识界三百余人”。他这种盗名欺世的卑劣作法，只能说明他政治上的反动和堕落。

在这一时期，陈一谔还直接给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非法组织以物质支持。他用公款为“高自联”、“外高联”提供了近四万元的资金和物资，给这些非法组织输血打气，并向“高自联”的人表示，“希望学生们能坚持下去”。

5月下旬，陈一谔看到大势已去后，转而慌忙组织“退却”，进而密谋外逃。5月23日上午，陈一谔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高山、农研中心发展所某负责人统一口径，特别是要求绝不能承认高山曾于5月19日到体改所泄露机密的事。5月24日下午，陈一谔召集体改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威胁说，谁揭发了体改所的问题，谁就是“叛徒”，就是“历史的罪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陈一谔仓皇出逃，走上背叛祖国的可耻道路。

正是根据陈一谔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的上述种种行为，国家体改委决定撤销陈一谔国家体改委委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继而又于1989年9月11日开除了陈一谔的公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党委报经上级党委批准，已于1989年8月18日开除了陈一谔的党籍。

自吹自擂实在令人咋舌

陈一谔在国外攻击、咒骂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大肆渲染他自己的历史，吹嘘他在改革10年中的“贡献”。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他那“光荣”的历史吧。

陈一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曾在自己所作的《小结》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参加首都三司，到全国十几个省市煽风点火。”

1976年在“四人帮”大搞“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也很卖力气。当时，他担任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出面组织大批判文章，主持召开各种批判大会，并利用这个机会批斗农村基层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确山县委组织部因陈一谔是“突(击)提(拔)干部，不称职”和“‘四人帮’横行期间受影响较深，对错误没有认识”等问题，经地委组织部批准，免去了他担任的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

在改革10年中，陈一谔是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我参与了农村改革的设立”，“也可以说一系列最基本农村改革的方略，我们都是最先提出的”呢？是不是像他这几年来一直吹嘘的那样，曾多次参加了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起草工作呢？不是。据有关同志介绍，中央几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没有参加，仅仅是

参加过1983年“一号文件”准备期间的一次讨论会。同时，陈一谔还到处宣称自己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的筹备工作，但据查证，陈一谔既没有参加过筹备十三大的组织工作，也不是十三大文件起草组的成员。陈一谔这些自吹自擂的言论，使熟悉内情的人为之咋舌。

实际上，陈一谔这几年来，不时以“研究改革”为名，行兜售其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之实。他或在《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一些场合讲演，时而隐晦、时而露骨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陈一谔常以反腐败的“英雄”自居。事实上，他却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据查证，几年来陈一谔利用职权两次为自己超标准购买和装修住房。1987年初，他指使人把体改所购置的一处200平方米的院落进行违章翻建，改建成11间用房（正房还作了高级装修），作为他个人居住的宅院，合计用公款15.2万元。1988年初，陈一谔又以装修质量差、风格太土为由，表示不愿居住。1989年2月，陈一谔又通过关系，以体改所建成的四套二室一厅共227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换得另一处三室一厅和二室一厅共150平方米的两套住房以供他享用。5月份，即动乱期间，陈一谔又指派人对这两套住房进行高级装修，费用都由体改所事业费开支。这次换房还花了请客送礼费2700元，也由他把持的所长基金开支。据查证，几年来所长基金共达人民币近20万元，另有一些外币，其中包括近两万美元。所长基金几乎成了陈一谔个人囊中之物，用于请客送礼，多次出国都违犯规定多带外汇，花掉一部分，还为他私人住宅预购书柜和写字台支取3500元，1989年5月下旬甚至私下取走5000元。

香港和海外个别不明真相的记者，轻信陈一谔的自我吹

嘘，成了陈一谔的吹鼓手，说陈一谔是一个“贵义而不贵惠的人”。面对陈一谔上述种种劣迹，吹鼓手们作何感想呢？

（原载1990年4月20日《经济参考》）

陈一谔从幕后来到幕前

· 韦 骥 ·

天安门广场乱哄哄的时候，陈一谔被视若钦差，然而藏头露尾，恐怕吾尔开希一流草头司令，也难窥真身的。暴乱平息，消失三个月，突然出现于巴黎，终于让人看见了头脸。海外、国外通讯社、报纸、刊物开列的头衔，除并非夸大的“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还有“逃往国外官阶最高的中共干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主要领导人之一”，“十年来均从事并支持中国的经改、政改设计，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主要顾问之一”，“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紫阳的首席智囊”，等等等等。第一个公布这露面的，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9月5日。只是主题太陈旧，不过学了方励之的老调：“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停止对中共实行的有限制裁”。好在人遇危难，哭爹喊娘，先供出师尊和大老板，算是验明了正身。接着有台湾《联合报》9月7日，发表“第一次接受中文报纸记者的访问”的报道；又讲一遍“对中国现在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倒也多了一手新招儿，是颇以为台湾报刊的反共宣传不够味儿，于是出题目，开定单，说社会主义中国“蔑视人权”，是“没有最基本自由、实行如此残暴政策的国家”，“希望你们也能宣传这个看法”云云。

据《联合报》10月17日报道，陈一谔“逃出大陆后第一次

公开演讲”，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记录载于《中国之春》第12期。办这之春的，是原先“西单墙”的难兄难弟。前“高级幕僚”、“首席智囊”，和“西单墙”的落魄将士，亲亲热热拥抱，一道吃美国饭，成了反对祖国的专业户，实在够滑稽，够悲哀的。

“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在八九民运的背后》。“八九”自然指1989年。“民运”应为动乱暴乱。最有趣的，是那“背后”。

演讲开头，以为“八九民运有五个原因”：

第一原因悼念胡耀邦，胡是耿直正派，为民请命的好人，八七年受不公正对待抑郁而死，大家觉得应该替他说话。第二原因对改革进程不满，通货膨胀，社会不公，官倒、特权越来越厉害，人民始终没必要的民主权力。第三原因对一系列社会现象不满，道德沦落，分配不公，特权腐败。第四是对工作失误不满。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的说，问题是工作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当然赢得老头们赞赏，可是老百姓觉得，怎么政府、党中央都是笨蛋，老是失误呢？因此，失误的宣传也鼓动群众。第五原因，学生运动发展，各阶层参加，是被政府态度所激怒。

怎么会闹出一场动乱暴乱，把个好端端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精英、智囊们曾经随了“美国之音”，信口雌黄出种种谣言。一言即出，传单贴满街巷，喇叭响彻广场。不过几个小时，真相大白，谣言消散；于是重新雌黄，贴满，响彻，消散。如今请出原先藏身背后的顾问、首席、主要领导人，专论“背后”，一开口，竟有五条之多。

“第一原因”，便令胡耀邦死期提早两年，把1989年改成

1987年。第二和第五，唠叨重叠，其实当并为一条。陈一谔的小计谋，是排出一堆丑事，却隐去主词。主词本来现成的。比如通货膨胀如何无害、如何高妙、如何救国，白纸黑字，就在前些年的报刊上，作者不正是陈一谔们么？要问官倒，状元即万润南，动乱暴乱时的财东，巴黎“民阵”里的要角，不妨就近立个样板，侃一套经验宣示世人。至于分配不公，——何不下一手谕，令横行于长安街的“飞虎队员”传授一二呢？

说到特权腐败，请出陈某人，已经足够。以大陆颇为紧张的住房论，自1987年到1989年，即得三处之多，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三间。接着是平房小院，盖车库和司机住房，正房里铺地板，贴壁纸，装吊灯，安浴盆和淋浴器，一场翻修，共房十一间，费公款15万余元，该是陈某75年的工资。然而首席仍旧发火，说质量差，再得三室一厅及二室一厅两套。照例是地板，壁纸，吊灯，浴室，所费已经节俭，为陈25年工资。三处电话，合计五部。只头一处的三间，即有彩色电视机三台，雅马哈电子琴二架，及录相机、组合音响之类，另有名酒百瓶列于柜中，补品百盒排于几下。

就派头，一级教授无人可以望其项背。据说他那个所长，在工资表上列入局级。即便部长，倘有其后两处住宅中的一处，也会因为超标准，定个违法乱纪，送交监察部门处理的。

我颇疑心，陈一谔早存了出逃的念头，那深层的恐惧，恐怕正在共产党的不许腐败。

第四条尤其古怪。列了“对工作失误不满”的大题目，文章却落在指责“失误的宣传”：“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的说，问题是工作的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

市场经济的政策”。这就是让读者纳闷，究竟这“鼓动群众”的，是“失误”呢，还是“失误的宣传”呢？李鹏“作总理后”，自然该对“失误的宣传”负责。然而倘说百姓只不满这宣传，却赞成那失误，这是无论怎样的观念更新，也让人糊涂的。

至于第五，把任什么罪责一概加诸政府，倒是集了智囊、精英们高见的大成。“学生运动”，当为“运动学生”。“各阶层参加”——也有别样的高见。万润南已经宣布，唯中产阶级与他们的政治“天然的联系”，却又偏偏尚未形成，因此，“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另有名不见经传的“民主流亡者”某人，在香港《潮流》去年12月号撰文，说那时虽然人潮如涌，“北京市民和工人是在旁观”，承认百姓与陈一谔、万润南们并无“天然的联系”。还有更坦率的话，说学生们的“背后”，“有一批在理论界活跃的主张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整个民主运动中只是少数”。如此这般，背后运动者的眉目，便愈难掩饰了。

陈一谔却不愿自认“黑手”。他说：

四月二十八日，李锡铭在北京市对处级以上干部说，这次学生运动有三个黑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一是体改所，一是农发所。我很奇怪，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

这里所说的体改所，即陈一谔任所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不知道李锡铭可曾有过这讲话。何况据陈一谔所引，其中并无他的名姓，回答却变成“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体改所即我即陈一谔所长。——“民主斗士”口里的民主，正是说的独裁。这恐怕也是全盘西化的洋货，令黄面孔中国人高深莫测的。

然而还有两条照旧出自台湾的材料。

《联合报》1989年12月30日有《张钢小档案》，说张系体改所“联络部长”，已经投靠台湾，去作“反共义士”。文中写道：“张钢透露，当时原‘体改所’所长陈一谔因腿疾不便出面，因而由他走到第一线指挥，他说：‘中共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好了！’”“义士”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宣誓，自然极豪壮的。只是读者会问，“第一线指挥”的幕后呢？

《中国时报》1989年9月13日，刊出该报在伦敦专访陈一谔的报道，倒已经提前揭出了谜底。赫然大字的标题，便指陈一谔为“‘民运’幕后总指挥”。报道还顺便转述陈一谔“送给台湾新生代的箴言”：“人要热，嘴要紧，脑子要复杂”。

“幕后总指挥”，即是《中国时报》专访之后的结论，足见无论怎样热、紧、复杂，还是露出一丝天机。不承认黑手，理由大约在嫌那评价的低。不过虽然有成打头衔，也确在幕后，确在指挥，“总”还要打折扣的。看那从幕后来到幕前，一番语无伦次，实在也不学无术和乏味得可以了。

（《中流》1990.5）

柴玲到美国去干了些什么？

· 陆 遥 ·

在美国总统布什权衡利弊作出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美国国会就此展开辩论的时候，逃到国外的通缉犯柴玲从法国到了美国，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是以“血洗天安门”的谎言为少数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议员提供“证言”，其目的是阻挠布什的决定在国会顺利通过。

柴玲“走红”不是偶然的。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叛逃“精英”们一年来在国外的丑恶表演，已引起国外华人、华侨的普遍反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所以一些议员便把宝押在柴玲身上，作为他们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一张牌。

柴玲于今年四月初逃到国外后，起初曾表示“为了求得心身的平静”，“暂不介入任何政治势力”。有些人以为她要同严家其、吾尔开希等“精英们”保持距离，以免重蹈他们的覆辙。然而，既然背叛了祖国，投入人家的怀抱，就得要干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所以经过近两个月对西方世界的“适应”和“自我调整”，这位所谓“民运”干将，就成为一个反华卒子走到台前来。

柴玲这次在“六·四”前夕专程从法国赴美活动，是由美国国会人权基金会出钱出面接待的，在华盛顿的一些重大活动都由他们安排。美国众议员佩洛西整天不离她的左右，给她当助手的是“全美学自联”和几个“人权组织”的人。在华盛

顿的五天活动中，他们不仅安排了美国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及一些议员会见柴玲，听取她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分析”，以及对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态度，而且还安排了副总统奎尔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分别接见柴玲，听取她对美国政府的献策。此外，柴玲还到叛逃“精英”们在华盛顿举行的“六·四”周年集会上发表讲话，出席美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在众议院人权委员会和参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非正式听证会上“作证”，让她在这些场合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政府进行诽谤攻击，对中国的国内局势进行歪曲诬蔑。

在这次赴美之行中，柴玲为美国某些议员提供反华炮弹颇为卖力，不过这些炮弹已没有多少新意，都是一些打不响的“臭弹”。

譬如，她不顾去年“六·四”风波真相早已大白的事实，继续重覆所谓天安门“大屠杀”的谎言。可是，这位现场“总指挥”，这回除了捏造一个北京女大学生企图阻挡坦克而被“压碎”的情节外，再也举不出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任何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证据。而且，这位女大学生的姓名，所在学校的名称，有关她的照片、录像等，一概说不出来，显然是一个查无实据的拙劣的编造。此外，她还提到西方报刊电视上大肆渲染的那张一个青年站在马路中央阻挡坦克前进的照片，吹捧这个青年如何“勇敢”，但是，人们冷静地细想，恐怕在处于戒严状态的任何国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完全有权合法地进行断然处置，而这张照片恰恰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纪律严明，尽力避免造成伤亡，否则，那个“螳臂挡坦克”的青年不早就被“压碎”了吗？

议”，
策，
是什

“六
民以
据报
议布
什么
把外
利益

政府
于太
去年
能事
與
“美

求身
系”
玲在
是理
一些
她”
有

此外，柴玲在华盛顿期间，美其名曰给美国当局提“建议”，实际上是给美国的一些人进一步干涉中国的内政献计献策，这就清楚地勾划出自己卖国洋奴的嘴脸。请看她的建议是什么货色：

其一是，为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叫好，说什么“在去年的‘六·四’学运中，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给学生和市民以很大的鼓舞”，并要求美国当局更加放手地支持“民运”。据报道，柴玲抵达华盛顿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她要“建议布什不要那么保守，应积极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还说什么，这对“维护美国的尊严和美国的利益均有利”。可见，把外国的利益和一小撮政治野心家的利益，置于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是叛逃“精英们”的一大特点。

其二是，吹捧“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影响力”，建议美国政府加强“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众所周知，“美国之音”由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造谣、中伤，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在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中，“美国之音”极尽造谣的能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公众和舆论的有力谴责。柴玲这个唯恐中国不乱的“精英”如此吹捧“美国之音”，只能说明她是死心塌地地反祖国的。

其三是，反对“无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她要求美国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即利用延长最惠国待遇压中国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柴玲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不是像其他“精英”们提出取消，而是要附加条件，这同某些美国议员的主张如出一辙。无怪乎一些明眼人认为，柴玲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是“别人塞给她”的。正因为是别人塞给她的，所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有许多问题“她自己讲不清楚”，一副应声虫的可怜相。

和柴玲一样，其他流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为了博得外国反华势力的支持，并借助他们的力量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都奴颜婢膝地乞求外国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进行经济制裁，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请看这些人的卖国嘴脸：

刘宾雁最近在美国康温狄格州一所学院发表讲演，声嘶力竭地反对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说：“继续给共产党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会使这一政权用经济和技术得益来加强它的控制，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在此以前，他还无耻地希望美国和西方世界“加紧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厚颜无耻地说，“中国人民愿付出这种代价”。

严家其则异想天开地指望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给他们提供翻案的机遇。他说，“对于中国的制裁，只有两个条件下可以停止，一是释放所有‘民运人士’，二是给‘民运’重新评价，肯定它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可见，这些动乱“精英”们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外国对中国的制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万润南则指望外国的经济制裁会加速中国的经济困难。他说，“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陈一谘则梦想通过西方的制裁，在中国“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的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也就可以早日回到大陆”。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动乱“精英”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千方百计地乞求国外的势力给自己的国家制造困难，梦想中国会出现混乱和灾难，这样便于他们浑水摸鱼。但是，这只

是他们可悲的一厢情愿。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实行制裁既无效也无益，是很难继续维持下去的。倒是要奉劝这些动乱“精英”们想一想：你们这样仰人鼻息的日子能长久地混下去吗？

（原载1990年7月2日《瞭望》周刊海外版）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文字难以辨认）

岂能靠谎言度日

· 睿 之 ·

最近，台湾的《中央日报》报道说，柴玲逃亡到美国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煞有介事地说，去年六四事件期间，除了有王卫林在长安街阻止了一列军队的坦克外，“另有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北大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她也曾阻止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她被坦克碾得粉碎”。在香港出版的一家刊物，也报道了柴玲六月三日在出席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集会上，向与会的二千多人说，除王卫林单人匹马站在坦克前外，北大的一名女学生亦同样孤身站在坦克车队前，一手叉腰，一手举起作停止讯号，但不幸坦克没有停止，继续往前在她的身上辗过。

曾记得，去年本港传媒曾播放过和刊载过柴玲的一篇录音讲话。在讲话中，她叙述了自己六四那天的一些经历，当时她尚不敢说自己亲眼目睹学生被打死的情节，都是用“据说……”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述。而这次她讲述这篇“鲜为人知的故事”就不再用“据说”了。“故事”被她描绘得如此活灵活现。可惜，除她之外，再无第二人讲过这个“故事”。那么，“故事”的发现者除了柴玲外，再无他人了。

“故事”发生在军队坦克要开进天安门广场之际。可是这时的柴玲在哪儿呢？最近抵达台湾的侯德健向记者作了一次“为‘六四’清场作证”的谈话。侯德健说，柴玲当时在指挥部

里，而且在军队清场之前，“柴玲在刘晓波、高新的要求下，带头领着学生撤退，还有封从德、李录和柴玲一起。”侯德建还坚持重申“广场没有看见死人”这句话。笔者也曾在本港一家刊物发表的独家图片上，见到六月四日早晨，柴玲和封从德等人打着旗、排着队抵达中关村的情景。所以，柴玲所谓亲眼见到一名北大女生被坦克轧得粉碎，实属可疑。

笔者带着这个疑问去询问中方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权威人士亦为此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他告诉笔者，关于去年北京发生暴乱期间，人员伤亡的情况，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等。”至于柴玲所说的那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权威人士十分负责地告诉笔者，这个“故事”纯属捏造。他说，去年暴乱期间，北京大学死亡的学生均为男生，绝无女生。北京其他各大学共死亡三名女生，但这三人的尸体是完整的，根本没有被坦克轧过的痕迹。当时参加戒严的部队也没有发现有女大学生因阻拦坦克而被轧死的情况。

这些事实证明柴玲是在编造谎言。堕落到靠谎言度日的人，多么可悲。她可能还会再编造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但这一个个“故事”只能使她头上自造的“光环”日趋暗淡。

（原载1990.7.25.香港《文汇报》）

岳武其人

李欣 宋郁

一个时期以来，在海外的一些报刊和电台上，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它们起劲地鼓吹着一个所谓的“流亡工人领袖”岳武。香港《百姓》半月刊杂志1989年9月16日第200期载文说：北京“工自联”的副总指挥岳武逃亡到法国，成为唯一在海外露面的“工人领袖”。台湾《东方日报》1990年1月18日报道称：“工运”重要人物岳武，已由法国抵达台湾。他将参加世界自由日运动周的有关活动；2月16日，该报刊登消息说，由原“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副总指挥岳武发起并任联络人的“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经过4个月的酝酿，周三在巴黎设立海外筹备处，正式开始办公。岳武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斗士”在港台报刊上发表谈话说：“我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我的立场是，谁支持民主运动，谁反对共产党，谁就是我的朋友。”

“北京工自联”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岳武又是一个什么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们在此仅作一些介绍和说明，以便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觉。

—
1989年5月，极少数人策划的震惊中外的动乱，已经持

续近一个月了。策划者们知道，单是学潮是闹不出大名堂的；只有把工人煽动起来，阴谋才能得逞。于是，早被取缔的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目任晓叮在北京各高校穿梭煽动：“学生要与工人联合起来……冲破专制，成功就会到来。”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主要成员胡平以及刘晓波等从美国纽约发来《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出主意说“加强与社会其它各界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带的大字报上，也有类似的阴谋。但是，他们企图煽动工人起来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昌盛。于是他们只好越俎代庖了。

他们先是冒充工人组织印刷《告全市人民书》，在新街口、西单、天安门广场等主要街道和繁华地区大量散发，妄图煽动工人罢工、市民罢市，把首都的经济搞瘫痪；并且大肆造谣说，“首钢的工人已经罢工啦！”对此，北京市总工会郑重发表声明，揭穿了他们的谎言。一些人组织了“飞虎队”冲击首钢，结果，又惨遭失败。

这时，极少数策划者经过紧张的密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拼凑一个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工自联”组织。5月18日夜11时许，由一个大学研究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发表了一通煽动性的演讲，就把几个听众中的响应者急急忙忙拼凑成了所谓“工自联”。

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叫嚷“推翻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反动宣传。5月26日，这个组织的头头在记者招待会上毫不隐讳地说：“我们要取消共产党。”并在回答“你们用什么手段对付政府”时说，“万不得已时，用武力手段唤起民众。”

无论他们怎样招兵买马，宣称“工农商学兵谁都可以参

加”，说什么“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参加我们的组织，吃饭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直到垮台之日，参与过他们活动的，一共才400余人。他们自己也说：“我们的队伍严重不纯，80%的人都是被单位开除的。”这哪里是什么工人组织！

二

岳武是个什么人？他根本不是北京的工人，既没有北京的户口，也没有在北京任何一家国营的、集体的、合资的、个体的企业做过一天工。那么，他是怎样当上了“北京工自联”的副总指挥的呢？

现已查明，岳武本是鞍山某技工学校的学生。1966年调到山西阳泉。1988年企业承包时，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承包了阳泉铝氧厂炼铁分厂，当了厂长。不到半年，炼铁分厂就亏损了28万元。总厂经过审计，发现岳武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有鉴于此，总厂于1989年春，决定中止与岳武的承包合同。岳武十分清楚：这不仅失掉了“厂长”的交椅，还预示着经济问题的败露。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动乱发生了，他满以为会像“文革”那样，在混乱中既可逃避罪责，又可混水摸鱼。于是，他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5月18日，岳武刚到北京不久，就窜到天安门广场。深夜，一个大学研究生正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演讲，煽动成立“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备处”。演讲刚结束，早在一旁伺机而动的岳武就大声喊道：“拥护刚才这位大学生的演讲，我们要组织起来，支持学生，保护学生的爱国行动。”经过这位研究生提议，当场成立了“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备处”临时指挥部。

指挥部设一正五副总指挥。当时在场的只有十几个人，自报公议，岳武便成了副总指挥。

“既然有了组织，那就应该写个宣言，亮出我们的观点！”岳武踌躇满志地提议。于是，由这位研究生执笔，广播、散发了《首都工人宣言》，威胁党中央和国务院，“必须在24小时之内，无条件地接受学生们的两点要求，否则从5月20日上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

有了“组织”，写了“宣言”，岳武又提出强占天安门西观礼台的通道作为活动据点，与盘踞在纪念碑下的“高自联”遥相呼应。天安门管理处曾多次派人催促令其撤出，这伙人气势汹汹地说：“等我们成功了，先找你们算帐，枪毙你们！”

在此期间，岳武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他人指手划脚；他竟然提出“武装起义，‘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连另外几个头头都认为“太过激”、“太暴露啦”。于是，5月22日夜晚，“工自联”其他几个头头一起开会，认为“岳武这人野心太大”，“很不可靠”，随即将其排除出5人“常委”的名单之外。5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处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时，宣布“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备处”改名为“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并公布了调整后的组织机构，免去了岳武“副总指挥”的“职务”。从5月18日深夜到5月23日下午，心怀叵测、做梦都想“发迹”的岳武，便结束了为期4天半的“工自联副总指挥”的生涯。此后，他独自游逛，自觉没趣，于5月30日灰溜溜地返回了山西阳泉。

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后，岳武如履薄冰。他预感到，无论他在“工自联”的问题是大是小，一旦事发，拔出萝卜带出泥，仅他的经济一案，便会被送上审判台。于是，他伪称外出催款，于6月12日携带公款3000元铤而走险，越境

叛逃。

三

岳武1966年从鞍山调到阳泉铝矾土矿时，正赶“文革”初期。时年不足20岁便造起反来，成为矿上一派群众组织小头目。从此，他官欲萌动，野心勃发，不择手段地苦心钻营，留下一串不光彩的足迹。

起初，他带领一伙小兄弟揪斗“走资派”，打砸抢抄，参与“文攻武卫”，当上“矿革委会”委员、“工代会”副主任。继而拉帮结派，卷入派性争斗。1970年，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胡编乱造，一个晚上写出长达120页的所谓“揭发交代”材料，咬伤100余名无辜，把57名干部和工人说成是“反革命嫌疑分子”。

“文革”期间，岳武抄家捣室弄来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等法西斯之流和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等辈的传文记事，如获至宝。他说，这些人真了不起，有抱负。人生一世如不能流芳百代，也要像他们遗臭万年。试想，像他这样的心理，怎么懂得什么叫“民主”、“自由”和“人权”呢。他投机钻营，曾经三次爬上领导岗位，每一次时运都不长，但他劣根性的表演却一次比一次出色。他将大打出手当成“革命行动”，用以对付职工群众。有一次，他将一名工人打昏在地，还不许人抢救。又一次，他将另一名工人的衣服剥光，用绳子捆了，拿皮带抽打，直至受害者皮开肉绽。还有一次，他率领一伙打手窜到附近学校，将一名小学教师缚于房柱殴打，临末抢走香烟3包，人民币100余元。职工群众看不过去，议论纷纷，他却说：“我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

岳武不仅在“文革”期间是一个整干部、整工人的造反派，而且是一个贪污腐化之辈。1988年，他承包炼铁分厂担任厂长不到半年，经总厂审计就发现岳武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经初步分析，除经营性损失外，岳武通过各种手段中饱私囊。其一，吃喝玩乐，挥霍无度。据不完全统计，仅吃喝一项，半年时间便用了3万元。他常对人夸耀：“吃喝嫖赌抽，你们谁能和我比！”其二，巧立名目，借票报帐。一次，他从衣袋掏出一张河北省某单位空白单据，填写劳务费，取走现金3400元。其三，私下交易，坐地分赃。从帐面上看，分厂有债权14家，金额达16万余元。查对结果，实际只有10万元。其余部分，有的是对方早已付款，分厂帐上未收；有的是根本没有债主；有的不仅不是债权反而是债务。仅一家用户，里外相差还欠对方1万余元。其四，里勾外联，盗卖产品。经证实，岳武曾多次暗地唆使外单位进厂偷运生铁，与不法分子从事倒卖活动。

在岳武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民主”二字的。他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不管他是对是错，都要别人绝对服从。有一回，岳武令会计做一笔3000元的假凭据，会计没有敢照办。他便借机大发雷霆，将会计的职务停了，并毫无道理扣发人家当月工资140元。那时正值盛夏，他非让这位女职工到热风炉劳动不可。事情并没有因此了结。一天岳武碰见会计的丈夫，问：“你知道你爱人为甚和我吵架？”

“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好，回去想想。从今天开始，停你3天工作。”就这样，几天以后，这位丈夫也被调换了工作。

看看岳武这几出拙劣表演，就足可让人们认清他的真实面目了。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权斗士”，而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斗人拳士”！

四

如果说，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岳武出于蒙蔽和欺骗学生与群众的需要，打着“民主”、“爱国”的堂皇旗号以售其奸的话，那么，逃离国境，踏入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之后，便迫不及待地一把扯去伪装，现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形。

据外电报道，去年8月，岳武来到巴黎，随即当上由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一伙拼凑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监事。

据《香港时报》1990年2月17日报道，今年2月14日，岳武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海外筹备处”。

据1989年9月16日出版的《百姓》半月刊杂志称，岳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激动地说，我虽然身在海外，但已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

在异国他乡，要重组“工自联”，谈何容易？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杂志1989年9月16日第200期报道，“岳武希望在成立‘工自联’巴黎总部后，能取得世界各地工会支持，特别是法国和香港的工会。”“不过，就巴黎的情况而言，岳武提出成立海外‘工自联’，并未得到热烈的反应。”“岳武看来正处于势孤力弱的环境中……”岳武只能同其他叛逃国门的动乱“精英”一样，千方百计讨好海外的反共、反华势力，求得主子的欢心与赏赐。甚至直接投入台湾当局的怀抱。而取悦主子的主要手段，便是攻击中国共产党，谩骂社会主义制度。据香港

《百姓》半月刊杂志报道，“岳武旗帜鲜明。他指出，必须打倒共产党，中国民主运动前途才有希望。所以，他准备在法国成立的‘工自联’，也是以‘打倒共产党’为口号。凡是支持他们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都可以成为盟友。”“在海外能够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因此，岳武承认并不会排斥来自台湾的资助。”果然，今年1月16日，岳武从法国来到台湾，在接受《香港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这次来台湾可能要逗留十几天，希望能够为‘中国工自联’筹得一些资金，并与台湾各个劳工团体作一些接触。”1月19日下午，岳武在台北圆山饭店参加由“世界及亚洲太平洋反共联盟中华民国总会”举办的“共党问题——东欧变局与中共困境”研讨会。他在专题报告中强调，“中华民国政府应全力给予支援。”1月22日，《香港时报》记者专访岳武：“你这次接受世亚盟邀请访台，与世亚盟这个坚决反共组织接触，你有没有顾忌？”岳武回答：“没有任何顾忌。我的立场是，谁支持民主运动，谁反对共产党，谁就是我的朋友。”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国人士，对岳武之流在海外的丑恶表演表示不满和愤慨。菲律宾的一家华侨组织写公开信斥责这伙叛国“精英”：“你们为自己争一席之地，罔顾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国家，糟踏自己的民族，咒骂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献媚、邀功请赏，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现！你们的行径是背祖忘宗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

岳武这样的民族败类，正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是，他又能够值几个钱呢？我们等着瞧吧。

（原载1990年7月30日《工人日报》）

主子的民主和奴才的民主

·韦 骥·

手头是几份去年十月十七日的旧报。

一份香港《明报》，刊出美联社发自纽约的消息：“中国民运示威者在联合国对面架起的营帐，最近遭美公园管理人员和警察破坏。”示威者之一说：“他们不动声色，早上一时便来到，然后取走我们的东西。”

一份台湾《联合报》，照样是发自纽约的消息：“高级幕僚陈一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逃出大陆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宣布“各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民运人士极大支持，因此正是爱民主的中国人形成联合的最好机会。”

同属中国“民运人士”，同在美国行事说话，结果却大不同。这不同，便显出不同的民主的界限。

美国派兵远征巴拿马，捉拿该国领导人到美国受审，叫民主。兵士包围、搜查别国驻巴拿马使馆，还叫民主。后来报纸登消息，说那该国领导人，本来是美国情报局人员。如此这般，美国兵的到异国杀人放火，似属管教下人的家事，他人无须多嘴的。中国古训有家法一说，到了旧戏舞台，已经化作木棍和竹板，专施于子弟和婢仆。视天下为婢仆，自封为地球太上皇，倒合乎美国权贵的气概。以世界之大，国家之多，民族之众，只要喝一声“家法侍候！”棍棒横扫天下的不同肤色，人人俯首，个个帖耳，该是何等威风。这自然

被民主而且无边无际的，——然而这是主子的民主。

那被“不动声色”收拾的脚色，实在也撒欢儿出了格，忘记了奴才的身份，在天安门广场，闹个帐篷一地，床单遮天，烧坦克，杀兵士，倒都以“爱民主”领赏的。何况早有天上“美国之音”的精神鼓励，地面美元的物资援助。如今未得意而先忘形，竟往美国安营扎寨，即便谦恭到只占公园的一角，却也逃不脱“不动声色”的小小惩戒。

陈一谔和一班精英兄弟，早已经先民主起来。他们不愧是幕僚而且高级，恐怕正在深知，无论在中国的摇了尚方宝剑，或是走巴黎，窜美国，溜台湾，都只奉行着主子眼色的民主。像这拔脚出奔，身体力行于国际大循环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尤见教养和功力的超人。要义只在“因此”二字：因外国人的“极大支持”，而有此中国“民运人士”爱民主的“最好机会”。

倘若套了这现代模式，便是：因反共卖国以讨洋赏，而有此高级幕僚奴才的民主。

（原载1990年3月8日《光明日报》）

叛逆“精英”海外言行录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编
中国 教育 报 社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4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1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册 (内部发行)

ISBN7-5041-0609-7/G·571 定价: 1.90元

9111169

(内部发行)

ISBN 7-5041-0609-7

G·571 定价：1.90元

